

NIDS CHINA SECURITY REPORT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18

— 站在岔路口的美中关系 —



防卫研究所编

本报告是防卫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根据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资料从独自的立场出发分析撰写的内容，并不是日本政府或防卫省的见解。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8

目 录

序言	iii
概要	iv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的对美政策	5
1 不断变化的中国对美姿态	6
2 在亚太地区的美中关系	10
3 特朗普政权与中国的对美政策	13
第二章 美国的对中政策	17
1 美国对中政策的演变	18
2 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动向的分析	25
3 美中的“战略稳定性”与东亚的地区安全	27
第三章 地区的美中关系的争议点	33
1 朝鲜半岛	34
2 南海	40
3 台湾问题	45
4 地区的美中关系格局	47
专栏 关于网络问题的中美关系	49
结语	51
注	54

序言

防卫研究所发行《中国安全战略报告》，关于中国的军事和安全，由本所的所属研究人员从中长期观点分析应关注的事态，向内外广泛提供。2011年3月以来，我们在各年度发行1期日文、英文、中文版报告。《中国安全战略报告》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媒体等的高度关注，同时，防卫研究所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分析，加深了包括中国在内、与各国、各地区研究机构和相关人员的交流及对话。

作为第8期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8》，以“站在岔路口的美中关系”为副标题，分析了中国的对美外交及安全战略、美国的对中外交及安全战略以及美中关系在东亚地区的演变。本报告阐明，从本世纪00年代后期开始，明显发生了中国崛起以及与此伴随的相对力量平衡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美中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外，我们在撰写时也参考了与美国、中国等国内外研究人员和相关人员进行意见交换获得的启示，注意提出客观性分析。撰写时参照的各种一次资料、二次资料记载于文末注脚。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8》是从研究人员独自的视点出发撰写的内容，并不是日本政府、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正式见解。本报告由山口信治（撰稿负责人、执笔第3章）、增田雅之（执笔第1章）、高桥杉雄（执笔第2章）以及八塚正晃（执笔专栏）执笔。此外，编辑工作由室冈铁夫（主编）、有江浩一、河野桂子、杉浦康之、西野正已、八塚正晃完成。

我们希望《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8》能够加深有关中国的国内外政策讨论，并且对深化日中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对话和交流、乃至开展协作作出贡献。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理论研究部部长 室冈铁夫
2018年2月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概要

本报告通过分析美中关于对方分别持有哪些认识、采取了怎样的政策性方针、以及美中关系在地区问题中如何变化发展，探究美中关系的中长期性倾向。

第一章 中国的对美政策

直到本世纪00年代初期，中国持有劣于美国的深刻认识，将本国定位于“发展中大国”，重视对美关系的稳定。然而由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相对性力量平衡发生变化中，中国逐渐加强了坚持自我。这就导致了所谓中国外交的强硬化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对立严重。关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论，根据原本作为核心利益的“相互尊重”的措词，对于中国考虑为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是将促使美国让步作为重点的概念。然而由于与周边国家的对立，对美关系逐渐恶化，中国开始担忧发生与美国的对决，因此渐渐地强调“不冲突、不对抗”，开始寻求美中关系的制度化。但另一方面，从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可以看出，中国对周边各国的立场没有发生大幅改变，因此对立的方向性没有出现变化。可以说中国在同时寻求两个方向，即对美关系的稳定以及强化在地区的自我主张。

对于未必受美中之间长期建立的原则限制的特朗普总统，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施加影响。中国对于美中关系的协调和稳定持有信心。然而，美中关系依然距离稳定相差甚远，对于在对话与合作方面寻求具体成果的特朗普政权，中国能够向美国提供何种程度的利益和价值依然无法确定。

第二章 美国的对中政策

对于冷战结束后未来的方向不明确的中国，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规诫不能抱以不必要的敌视，采取了进行“干预”的方针，使中国不会构成安全的威胁。布什政权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对待，在其中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被称为“塑造与防范”的方针成为对中政策的基本内容。奥巴马政权延续了布什政权的姿态，采取了以“战略再保证”的措词为代表的“如果保证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中国将与美国合作，为了世界的稳定发挥负责任的作用”方针。然而后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强硬，在美中关系的发展中，竞争的一面受到重视，奥巴马政权采取了“重返亚太”政策。特朗普政权发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试图将美国从印度太平洋地区赶走”，表明了极为高度的戒备，宣布放弃以往的干预政策。

分析关于美中战略稳定性状况，与“危机下的稳定性”相比，美国重视“军备竞赛下的稳定性，不提相互脆弱性，而是采用强调透明性和信赖的重要性方式的宣言政策。这是因为美中之间的核力量存在巨大差距以及宣称相互脆弱性可能导致“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具体化，因此可认为是妥善的政策。无论从地区安全的观点还是从全球化核军备管理体制的观点考虑，中国的核力量以及有关其战略的不透明性令人担忧。

第三章 地区的美中关系的争议点

观察地区的美中关系的发展，虽然双方致力于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双方的不信任增加。

朝鲜半岛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稳定、和平解决、无核化非常重要。中国却不希望为此使北朝鲜垮台、或者使美韩同盟得到加强。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而言，朝鲜半岛无核化最为重要，并且也涉及到对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安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存在取决于北朝鲜的行动而发生难以控制事态危机的可能性。

关于南海问题，近年来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显著提高，虽然说其主张没有被明确定义，但是被视为应收复的领土。另一方面作为美国，航行自由和遵守海洋的法规秩序重要，并且也涉及到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关于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也较多，并且是已成为近年来急速发展的美中关系焦点的问题，不存在能够稳定处理问题的机制。因此，不能说该问题的稳定性高。

台湾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的最重要问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未来一定要统一的领土。对于美国而言，台湾问题是应该按照一个中国的政策、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等维持承诺、维护和平稳定的问题。因为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高度，所以是存在发生最大规模冲突可能性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美中确立了稳定处理台湾问题的行动规范，因此，或许可以说问题的稳定性较高。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18

— 站在岔路口的美中关系 —

前言

（撰稿人：山口信治）



前言

美中关系是对国际政治产生最大影响的两国间关系。美中关系对地区性问题、全球性问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地区问题的演变也有左右美中关系应有状态的一面。

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规模方面是重要的存在，美国和中国无论在国内总产值还是在国防预算方面也都分别占据全球第1位和第2位，在世界上占有较高的份额。另外，中国的崛起是明显的倾向。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相对力量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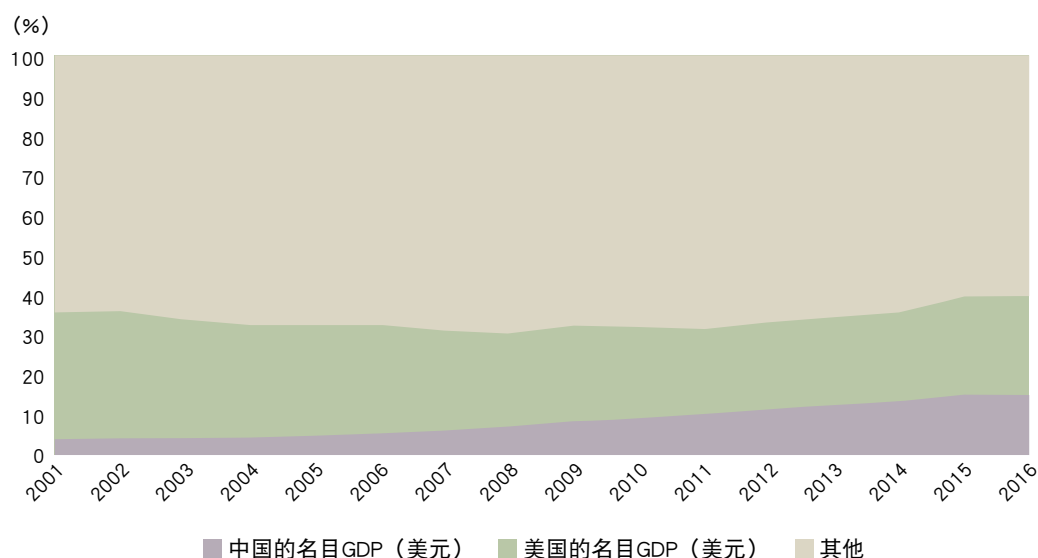
中国的崛起造成了相对力量平衡的变化。美国是现存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论，相对性力量平衡的变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促使国际政治变化的要因。政治学者Graham G. Allison将原有的超级大国与崛起的国家面对的可能导致全面冲突的紧张关系称为“修昔底德陷阱”，指出美中之间也存在这样的紧张关系¹。

问题是在现实中，具体的美中关系将如何演变、如何竞争、如何协调。观察进入21世纪后的美中关系，可以发现探索协调和相互对立的两个动向。作为美国，曾经认为能够划定中国的发展方向，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而作为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试图规定在中国崛起基础上新的美中关系的应有状态。

但是，美中之间存在着产生对立的难题，例如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这些问题并不是新的问题，相反，许多问题起源于冷战时期。然而围绕这些问题，美中关系的格局发生着变化。作为本世纪10年代的美中关系，这种对立与竞争的侧面正在显现。能否无论如何稳定控制、运作这样的战略性竞争关系，或者这种竞争引发冲突，这些因素或许尤其会影响到东亚地区问题怎样演变。

本报告基于上述问题意识，阐明美中分别关于对方持有哪些认识、采取了怎样的

图0-1：GDP份额（名目）



（出处）笔者根据各种报道编制。

政策方针、以及中美关系在地区问题方面发生过哪些演变。这些内容对于今后的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以及哪些将成为重要的因素，在考虑这些更加重要的问题时可能将不可或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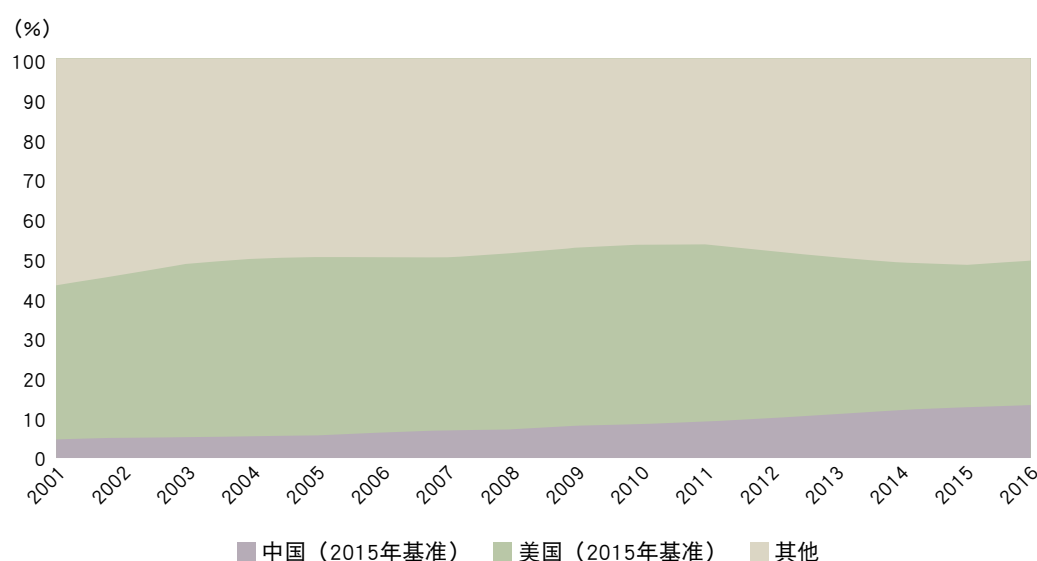
当然，目前的中美关系并不仅局限于这些地区性问题。在气候变动以及全球化经济等方面，中美开展合作可能是重要且困难的问题²。在中国寻求“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局势下，美国将推进怎样的经济秩序设想，这一点将成为今后在亚洲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地区的两国政治性关系以及安全问题对于推测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亚洲地区的未来发展必不可缺。基于这些观点，本报告的分析集中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问题。

另外，特朗普政权于2017年在美国诞生，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不确定因素。在特朗普执政下，中美关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论点。然而在本报告中，我们在考虑当前的变化的同时，将焦点集中于分析中期性动向，尤其探究从本世纪00年代后期开始的变化。

本报告由以下内容构成。首先，我们在第1章分析站在中国立场考虑的中美关系。第1节阐明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格局；第2节以“新型大国关系”论的变化为中心，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第3节讨论中国如何看待特朗普政权的诞生。我们在第2章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第1节讨论作为21世纪美国对华政策基调的“塑造与防范”；第2节论述美国关于中国军事力量动向的分析，特别阐述关于核力量的分析；第3节分析有关战略性稳定的讨论。在第3章，作为地区性中美关系的争议点，分别分析朝鲜半岛、南海以及台湾问题。

(撰稿人：山口信治)

图0-2：国防经费份额的变化



(出处) 笔者根据各种报道编制。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18

— 站在岔路口的美中关系 —

第一章 中国的对美政策

（撰稿人：增田雅之）



1 不断变化的中国对美姿态

(1)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慎重对外姿态——胡锦涛执政前期

中国始终将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作为最重要的外交课题。“国际形势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并没有改变”(江泽民)¹，对于中国而言，与美国的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两国间关系之一”(胡锦涛)²。另一方面，在过去的10年期间，中国的对美姿态向更加坚持自我的方向变化。

首先，让我们从中国的自我认识和对国际局势认识的角度出发，确认变化前的中国对外姿态。直到胡锦涛政权前半期为止，中国正式的自我认识始终是“发展中大国”。另外，对于国际局势的认识也较为慎重。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六大）和于2003年3月召开的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后诞生了胡锦涛政权，在该政权的初期，将解决国内问题作为最重要课题，采取了慎重的对外姿态。其明显的表现是对江泽民于2002年5月提出将形势判断为“战略机遇期”的应有领会。江泽民提出，21世纪头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³，胡锦涛政权对江泽民的乐观性局势分析逐渐进行了修改。

在2003年1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对战略机遇期进行了以下论述。即“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⁴。在此，胡锦涛强调的是丧失战略机遇期的可能性，是这种风险。在2004年2月举行的第10次集体学习中，集中讨论了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中国面临的挑战，胡锦涛做出了以下论述。“要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省略）…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将长期并存”⁵。

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七大）的2007年，中国公开表明了这种自我认识。2月，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再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根据这个观点，关于对外政策温总理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另外温总理阐明，为了坚持这项长期性方针，“必须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即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也应该坚持这个方针”。

在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在报告中也进行了以下论述，谈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⁷。中国虽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针也较为慎重。也就是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的“韬光养晦”，温家宝坚持“在国际上不扛旗、不当头”的方针。

作为外交任务，为了“维护战略机遇期”，胡锦涛要求营造“四个环境”（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⁸。其中胡锦涛强调，中国外交的关键是与大国的关系，应将美国作为“仍然是我们在国际上需要打交道的主要对手”，要坚持“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争取中美关系在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取得进展”⁹。

（2）力量转变与坚持自我的强化——胡锦涛执政后期

受2008年下半年发生雷曼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胡锦涛政权的对外姿态开始出现变化。2009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17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指出，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指出“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此出现新态势”，不仅是经济框架，而且通过政治性思路也看到了力量平衡的变化预兆¹⁰。

在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大使等参加、于同年7月举行的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关于这样的变化预兆胡锦涛指出“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¹¹，将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国际形势变化作为外交方面的机遇。另外，胡锦涛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要求，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这就是胡锦涛要求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四力”，即“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会议结束后，在中国国内特别大力宣传“四力”的观点¹²，与胡锦涛在2004年8月举行的第10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环境”相比，胡锦涛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理解为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力量更加直接的表述。

此外，胡锦涛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为中国的外交方针提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¹³。也就是在坚持以往的“韬光养晦”方针的同时，要求开展“积极有所作为”的外交活动。关于能够实现积极外交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最关键的是有了对于通过力量平衡的变化使中国的对美外交立场得到强化的认识。作为直属中国外交部的智囊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时的名称）的崔洪建研究员指出，“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剧烈震荡并引发政治效应，充分暴露了相互依存体系的脆弱性和一极主导世界的危险性”。因此，可以考虑“作为传统势力的美国”也能够通过与“作为新兴势力代表的中国”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¹⁴。

根据加强对美外交立场的认识，胡锦涛政权展开了进一步坚持自我的对美政策。国家主席胡锦涛向2009年11月访问中国的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强调，“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¹⁵，并且在联合声明中也按照中方的要求写入了两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内容¹⁶。另外，胡锦涛主席表明，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指“在台湾等问题中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两国之间的“战略相互信赖”作为前提。中国的许多主流媒体和专家将该“尊重核心利益”的内容视为联合声明的意义¹⁷。

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中，对于随着中国的崛起应采取的对外政策的讨论积极踊跃。在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2010年3月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尤其就对美关系的应有姿态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因中国的实力提升和利益扩大而要求积极开展对外行动的意见。对于同年1月底奥巴马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总额为64亿美元的武器，中国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对此按照这个思路也获得了肯定性评价¹⁸。“以前中国只是较为柔和的口头反对，现在不仅措词强硬，并开始付之于行动”，在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表明了美国应该适应中国对外应对新方式的意见¹⁹。

（3）动摇的对外姿态

在军事安全领域，中国要求利益尊重的态度明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会见访问中国出席2010年5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第2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的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上将以及助理国防部长华莱士·格雷格森时指出，美对台军售、美舰机对中国专属经济区海空域的频繁侦察活动以及限制两军交流的美《2000年度国防授权法》等是长期以来影响两军关系稳定的最主要的障碍，美方对这些问题体现诚意是恢复和发展两军关系的条件²⁰。马晓天进一步强调，“美方能否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关键，批评了美国的对中姿态。虽然在2009年11月发表的美中联合声明中提出的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是马晓天提出的是“切实尊重”，并举例阐明障碍并不仅限于对台军售，也包含其他问题。这就是广泛且严格要求对“核心利益的尊重”的军方的对美立场。

另外，作为对2010年3月发生的北韓制造的天安号事件的对抗措施，在5月底表明美韩两军将在韩国近海举行反潜演习和有关海上封锁活动的演习后，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在传出美国海军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参加在黄海举行的美韩联合演习后，中国军方表示强烈反对。7月1日，马副总参谋长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表示，“因为是在黄海，距离中国领海很近，举行这样的演习，我们是非常反对的”²¹。除了这种口头表示反对之外，解放军在黄海周边等不断举行演习。从6月底到7月，东海舰队在浙江省海域的东海进行实弹演习，7月中旬也同样在东海进行反舰导弹演习，8月也在相同海域进行实弹演习。另外，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开始的7月25日，南京军区炮兵部队在黄海附近进行了大规模实兵实弹演习。对于这一系列演习，虽然宣称是按照年度计划进行的通常演习，然而在中国国内被解释为解放军对以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为首的美国军事行动的应对²²。

然而，中国对外姿态的强硬化不仅对于美国、而且也引发了地区各国及相关国家之间共同的对中戒备。例如，在2010年5月举行的日美国防部长会谈中，对于为了应对

中国海军活动的日美合作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在尖阁列岛海域发生渔船撞船事件后的9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尖阁列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²³。另外，菅直人首相与访日出席11月在横滨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言及日中之间以及日俄之间存在的问题，同时阐明“在国民层面对于日美同盟和美军的存在重要性的认识加深”²⁴。

东南亚各国也在促使美国加强干预地区的安全。越南举行与美国的联合训练，东盟总体也要求美国加强干预。也就是由于东盟“直接面对复杂的、超越国境的安全的挑战”，因此要求区域外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东盟防长会议（ADMM）的努力做出贡献，东盟决定增加以美国为首的区域外8国国防部长设立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²⁵，2010年10月在河内举行了首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特别由于中国在南海频繁开展海洋活动和强硬立场，美国也阐明了加强干预地区安全的姿态。同年7月，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的克林顿国务卿表示，由于“美国将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视为其国家利益”，所以支持根据“国际法、而不是通过强行或武力威慑”、以及“多国之间的探讨”解决南海的主权问题²⁶。克林顿国务卿的发言是对东盟各国外长将中国的行为视为问题而表明意见的支持²⁷。

在出现对抗中国的国际环境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开始重新讨论对外关系的应有方针。一个是2009年以后增加的对核心利益论的批判性见解的提示。2010年10月，在召开中共中央第17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五中全会）后，国务委员戴秉国执笔了论文“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再次确认“和平发展的道路”的外交方针，然后全面阐述了中国战略意图、如何看待中国取得的发展、发展起来后的中国外交战略、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运用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等²⁸。该论文将中国的战略意图“归纳为和平发展四个字”，即对内求和谐、求发展，对外求和平、求合作。这是在今后很长时期里，我们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想的一件事，要做的一件事，是我们百年、千年也不会动摇的一个方针”。根据这个基本方针，“不当头、不称霸是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按照这个思想，在该论文中也提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其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立场。

国内许多主要媒体登载了戴秉国的论文，再次谈起“和平发展”以及“韬光养晦”战略，然而《解放军报》却没有登载该论文。关于军方对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方针，在2011年1月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发表的“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时代内涵 明确我们的历史使命和担当”的论文中体现²⁹。马晓天的论文也是在五中全会后执笔，该论文的依据是胡锦涛在五中全会上的发言，“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在马晓天的论文中值得回味的是由此揭示的基本认识。一个是马晓天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确立是客观性条件与主观认识的有机结合”的基本认识。即指出“没有必要的内外客观条件，就不会有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提出“战略机遇期需要强烈的发展意愿和敏锐的战略洞察力”，强调“有利的内外形势并不能自动形成战略机遇期”。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该论文言及邓小平提出的“绝不当头”的说法，指出“这可称为是维持战略机遇期基本条件之一”。然而接下来马晓天阐述，“力求稳妥并不等于无所作为”，进而主张“积极有所作为同等重要”。也就是军方表明了强调需要采取主动、积极行动的见解。

如本节所述，胡锦涛曾提出的中国对外姿态是“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无论是戴秉国论文还是马晓天论文，两者都是依照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发言以及党中央的决定提出的论述。问题在于将重点放在“坚持韬光养晦”还是“积极有所作为”。然而，尽管胡锦涛政权指出其平衡，但是在慎重论与激进论相互对立的政治环境中，并没有规定明确的优先顺序。因此，胡锦涛政权后期的中国外交尤其在安全领域动摇在慎重与激进之间。

2 在亚太地区的美中关系

(1) 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与习近平的重新定义“新型大国关系”理念

“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对美政策的关键词，中方是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2月访美时首次提出了这种观点。但是外交部门已在更早的阶段向美方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论。在2009年7月于华盛顿召开的第1轮美中S&ED会议上，国务委员戴秉国已经指出应构建“新型大国关系”³⁰，从此在每年召开S&ED会议时，中方都不断提到“新型大国关系”论³¹。

如上所述，以奥巴马政权的诞生为契机，当时的胡锦涛政权曾将“相互尊重”作为首要政策课题发展对美关系。关于戴秉国谈到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论也同样，其附加词是“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合作共赢”。这些附加词的含义是，美中两国应该政治上对等，尊重相互的立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也要友好共存；在经济上互惠。关于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从中方的观点考虑，原本“相互尊重”是其核心性理念，作为具体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向美方要求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进入2012年后，中方关于美中“新型大国关系”论的讨论出现了变化。在5月份于北京召开的第4轮S&ED会议开幕式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向美方呼吁，“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以及“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³²。作为在第4轮S&ED框架下进行的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的双方，中方强调了新型大

国关系的关键词。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在战略对话中，两国就如何创建新型大国关系交换意见，国务委员戴秉国指出，“两国有智慧、有能力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相遇的老问题找到新答案”³³。作为美中之间应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目的，胡锦涛提出应避免两国发生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

2012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八大），习近平政权诞生，对美中“新型大国关系论”的理念进行了明确修正，也就是对美中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附加词的修改。对于在2013年6月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中方对其的事前定位是为了“积极探索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³⁴。在与奥巴马进行的一系列元首会晤中，习近平谈到，“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提出“新型大国关系”³⁵。

6月8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之间的会晤后举行吹风会，介绍美中元首会晤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关于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阐明了3项内容³⁶，也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后两项是胡锦涛政权始终强调的理念。对此，“不冲突、不对抗”的措词意味着将力量转变论的观点明确纳入“新型大国关系”论，同时将“不冲突、不对抗”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1项内容。此后，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附加词便统一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³⁷。

作为美中关于“新型大国关系”论的中方重点转移的背景，可以说是中国对奥巴马政权的亚太再平衡（最初被称为重返亚太）、特别是对其军事方面加强了戒备。2012年夏，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从2013年4月起任驻美大使）在发表的文章“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中论述，美中两国对于“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需要解决5个难题³⁸，即，①应对战略互信缺失，②解决核心利益瓶颈，③真正践行平等相待，④贸易结构重组，⑤在亚太地区真正实现良性互动。值得注意的是第1个难题，对于奥巴马政权的再平衡也在该文章中谈到。“在‘重返’亚太过程中，美大力强化同盟体系、推进亚太反导体系、推行‘海空一体战’、插手中国与周边有关国家分歧等，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想借此向中国和地区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不仅中方有疑问，地区国家也感到不安。如何让中方、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相信美国对华政策表述与真实意图之间不存在‘鸿沟’，是美国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³⁹。

根据这种认识，崔天凯副部长将美中关系“在亚太地区真正实现良性互动”作为美中关系的当务之急。崔天凯强调，“近期，在中国周边地区发生了一些问题，中方并不是始作俑者，更不是施害者，而是受害者，被别人强加到头上”。进而指出中国与周边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以及中国对地区合作机制的积极立场，并且严厉批判，“美国力推冷战色彩浓厚的军事同盟建设、扩充军力等，这与和平、发展、合作的地区主流民意不相符”⁴⁰。

关于奥巴马政权的再平衡，从以下两点可认为是中国遇到的较大挑战。首先，认为美国对中造成威胁的认识提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关于再平衡进行研究，对奥巴马政权的重返亚太评价为“虽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谈到在地区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的影响力，发生了对美国不利的变化，在美国人眼中，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霸权国与挑战国的特征已更加凸显⁴¹。由此，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将使中国面临的美国直接军事压力上升⁴²。

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美国与同盟国以及伙伴国之间军事关系的强化，促进加强同盟网络化。分析指出，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等的国家对于美国的干预也抱有疑虑，这些国家积极响应奥巴马政权的再平衡，想提前选择站在美国一边⁴³。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将难以解决领土问题，中美关系恶化将不可避免。

为了阻止这些可能性，习近平政权重新定义了美中“新型大国关系”论，对于与美国的的关系目前应优先考虑的政策课题并不是“相互尊重”，而是“不冲突、不对抗”。

(2) 两军关系的“制度化”与其局限性

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美中关系，习近平政权致力于实现中美关系的制度化。胡锦涛政权也同奥巴马政权每年举行数次元首会晤等，加强元首之间的沟通，并且使以S&ED（自2009年开始）以及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自2010年开始）为首的对话和磋商实现高层化和制度化。然而就总体而言，当初的制度化是以奥巴马政权一方为主导，中国将首要政策课题定为“相互尊重”。

习近平政权为了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的关系，进一步强调了“分歧管控”的必要性。根据中方的见解，“分歧管控”明显区别于危机的善后管理，是一种长效性和预防性的管理，侧重于日常机制构建、重大政策协调和行为规则的制定⁴⁴。

被作为焦点的是中美两军的关系，中国领导人积极推动在美中之间达成有关构建军事互信机制（CBM）的共识。在2013年6月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了两军关系的发展落后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军事领域的两个互信机制方案，即应构建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制度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2014年4月，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WPNS）年会在青岛举行，会议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同年11月，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2015年9月，双方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CBM的积极态度。这是因为中美两军之间存在“三大差距”（军力差距、任务差距、体制差距），所以认为CBM的发展艰难⁴⁵。另外，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海军的法律手册中谈到，即使在美中之间共同建立了海上部队行为准则，对其效果也存在疑问。这是由于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海军战略和海军运用方式存在“相

当大的差异”，再加之“双方对有关国际海洋法规则有不同的理解”成为根本性问题⁴⁶。此外，如果与在能力方面差距显著的美军之间达成CBM，中国认为将成为阻碍寻求提高军事力量和扩大行动范围的解放军、特别是海军发展的要因。

习近平政权成立后，解放军领导层也明确强调，通过构建军事交流以及两军之间的危机管理等机制控制两军之间存在问题的必要性。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范长龙也谈到，除了高层的沟通和交流外通过实务合作强化原有机制以及运用CBM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⁴⁷。另外，在美中国防部门之间，也实现了在推进达成CBM过程中两军的战略计划、政策部门之间的人员交流机制的设置、以及有关人道援助和应对灾害（HA/DR）的联合训练等。

但是，可能无法仅从美中之间的政治意图出发来评价两军之间的CBM以及制度化的进展。美中之间于1998年1月签订海上军事安全磋商（MMCA），讨论了为了预防军事性不测事态的部队行为安全准则及步骤。在此期间，要求共有安全准则的美方与作为其前提要求美军停止在中国周边的“侦察活动”的中方之间难以形成磋商。

另一方面，MMCA工作小组会议对美中两国已签订的海上安全航行以及飞行和通信国际公约继续进行讨论，在1999年举行的第2次MMCA年度会晤上，再度确认了美中两国已签署的国际公约，以此为依据，双方就军用舰机互见距离内应避免危险达成共识⁴⁸。2001年发生美中军机撞机事件后，对于国际公约中的具体内容意味着怎样的部队行为也在MMCA上讨论⁴⁹。2014至2015年，关于海域空域的部队行为准则达成的共识可以说是通过15年以上的共同磋商取得的成果。

然而，尽管两军关系实现了制度化，美中之间在军事方面的竞争关系增强。尤其是中国在南海加速改变现状的行为。根据美国国防部消息，中国于2013年12月在南海南沙群岛开始了填海造岛。至2015年后期在不到两年期间，中国填埋的海域达到3,200英亩（约13平方公里），其规模已经是其他纷争国家合计50英亩的64倍⁵⁰。另外，在3个人工岛建造了军机也可起降的3,000m级跑道，2015年10月进入了设置基础设施阶段⁵¹。2016年1月，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装备了远程地对空导弹和反舰导弹，军机（运-8运输机）于4月首次在建造的人工岛中的永暑岛机场着陆。

由此可见，关于在美中之间两军关系的制度化尝试，可以说使两军关系的持续性对话和危机管理成为可能。然而也非常明显，在两国之间产生的战略性竞争关系并没有消除。

3 特朗普政权与中国的对美政策

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对于被中国视为民粹派的特朗普就任总统，在中国国内被理解为挑战。首先，关于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的政策，最终被中国国内的许多美国问题专家解读为“美国经济第一、美国贸易第一、

美国就业岗位第一”⁵²。“凡是危及这些利益的国家都被视为美国利益的危害者”，中国也不例外。

事实上在选举期间，对于中国特朗普认为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夺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公开表明将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关于人民币汇率特朗普也断定，中国为了提高对美出口竞争力，操纵压低对美元的汇率。

此外，在当选总统后的2016年12月，特朗普先发了一条消息说，“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当选总统。谢谢！”。然后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与中国没有贸易等方面达成一些交易，不知道美国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表明了“包括‘一个中国’在内所有事项都在谈判之列”的认识⁵³，也就是表明将贸易问题与作为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联系起来的方针。

如果这项方针作为政策推行，中方认为将突破中国设定的中美关系原则。一名中国国内的美中关系专家表示，在迄今为止的美中关系中，关于如何处理政治、军事、战略性问题存在“单边默契”。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对台军售问题），将其“搁置”以促进美中之间战略合作的形成属于“单边默契”⁵⁴。特朗普提出调整“一个中国”政策，中国认为是违反这种“单边默契”的行为。

对于未必恪守美中之间长期建立的原则、属于政治外行的特朗普，中国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影响。结果表明，特朗普总统对台湾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2017年2月9日，习近平与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根据白宫的新闻发布，两国元首“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对尊重（honor）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达成一致”⁵⁵。白宫的新闻发布采用了“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对此，虽然可以考虑为暗示并没有完全同意中方的立场，然而尊重“一个中国”政策的本身⁵⁶。根据中方的报道，特朗普强调，“我充分理解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高度重要性，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⁵⁷。

关于这次电话会谈中方强调，不仅是台湾问题，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就是确认了“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拓展广泛双边领域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是中美关系不会改变的发展方向⁵⁸。

在2017年4月举行的元首会晤中对上述中美关系的原则又再度予以确认，今后的课题是予以实现⁵⁹。另外，两国元首同意，除了成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4个新对话机制外，有达成该等相关部会首长每年举行一次全面性对话的协议。对此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⁶⁰。根据《人民日报》，特朗普总统也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谈得很好，建立了非凡的友谊。此次会晤取得重要、丰硕成果，有力推动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⁶¹。

另外，假如特朗普在对外关系中强烈要求确保国家利益，可以认为中国国内具有中国能够对此应对的自信。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强调，“在国家利益至上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合作成为历史必然”⁶²。特别是“中美经济和金融关系密切，已经形成交叉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关系虽有波折，但大方向是

朝前发展的”。其他专家提出，无意识形态制约的特朗普政权对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中国而言，往后机会更大。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市场规模，能够向美国提供许多经济上的利益，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也根深蒂固⁶³。

但是，中美关系依然距离稳定相差甚远。2017年6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詹姆斯·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共同主持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等参加。在对话中，朝鲜半岛核问题成为中心议题之一。中方提出“双暂停”的主张，也就是使北韩暂时停止核武器和导弹开发，另一方面也暂时停止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演习等施加军事压力⁶⁴。然而，与为了防止事态升级对北韩“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压力”、同时“继续采取防卫本国和同盟国的必要措施”的美方立场不同没有消除⁶⁵。奥巴马政权时期举行S&ED时曾为惯例的联合新闻发布会没有召开，美方提出制定合作文件的要求也被搁置。

在同特朗普政权之间新设立的美中对话机制与奥巴马政权时期不同的是以解决更加个别、具体的问题为目的。特朗普政权对曾经是中美关系“制度化”的象征性框架S&ED认为是“超载的卡车”，对与中国的关系要求更加实质性的成果⁶⁶。作为S&ED，结合全体会议实施各领域的对话和协商；而作为新的4个对话机制，不是结合全体会议的全面对话实施，而是单独对各领域的问题以及合作进行讨论寻求成果。

特朗普政权要求的与中国对话及合作的成果成为更加具体、实质性内容的可能性较高。对于美方的这种要求，中国能够向美国提供何种程度的利益和价值依然不确定。另外，即使假设以经济为中心进行交易，并不能由此消除在军事安全方面增加的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本身。

最后对本章内容进行总结。2008年后期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对全球力量平衡在逐渐发生变化的认识。因此，中国的对外立场开始向更加坚持自我的方向变化。胡锦涛政权在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的同时，虽然主张“积极有所作为”，然而并没有形成新的政策概念。在安全领域，中国国内的权利主张增强，对此在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关系中如何定位是直接面对的课题。但是在慎重论和积极乐观论之间，中国的对美政策发生动摇，缺乏稳定。

在奥巴马政权强化再平衡战略的军事侧面过程中，中国从2009年开始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论的理念发生了变化。以往的“新型大国关系”论是致力于使美方认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中国领导人从2012年开始从力量转变论的观点出发提出。习近平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论的首要内涵设定为“不冲突、不对抗”，推进包括两军关

系在内的中美关系制度化。然而如同围绕南海问题的美中关系暗示的那样，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加强。

特朗普政权在美国诞生，产生了挑战迄今为止在美中之间建立的、被中方视为两国关系“原则”的可能性。但是，试图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运营对外关系的该政权的诞生，对于已成为经济大国的中国而言，从利益交换的观点考虑，主张机遇的见解在中国国内扩大。

(撰稿人：增田雅之)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18

— 站在岔路口的美中关系 —

第二章 美国的对中政策

（撰稿人：高桥杉雄）



1 美国对中政策的演变

(1) 布什政权：“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塑造与防范（Shape and Hedge）”

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竞争的冷战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结束后，人们曾认为美国的新战略课题将可能会是中国。然而，当时的中国刚刚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成长也刚起步。因此，在提出如何可能成为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中国构建关系的问题之前，对中国能否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回答的本身尚不明确。而是尽管在总体上存在对中国未来含糊的不透明感，但人们也有对伴随“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市场的期待，正如一种说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他们就会变成敌人”那样，对于中国的崛起不能抱以不必要的敌视，可以说这种潮流在亚洲安全专家之间占主流。克林顿政权制定了对中政策的基本方针，即进行“干预（engagement）”，使中国不会构成安全方面的威胁。

2001年1月诞生的布什政权初期，人们预测美国对中政策将会严苛。特别是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访问中国时，尽管在中国停留了9天但也没有路过同盟国日本，因此当时受到共和党亚洲专家们的批评。另外，议会于1998年成立了“美国国家安全以及有关中国的军事、商业利益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9年5月发表了报告书（冠以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委员长的名字被称为“考克斯报告”）。该报告对中国在美国国内的各种情报收集活动提出强烈指责等，因此共和党布什政权担忧中国将来有可能成为“势均力敌的竞争者”。于是人们观测将采取在重视同盟国的同时对中国更加对立政策的方向。在这种形势下，2001年4月发生了在南海进行侦查活动的美军EP-3E军机与中国空军的战斗机相撞事件，中方的战斗机坠毁，EP-3E在海南岛紧急着陆。虽然中美关系因这次美中军机撞机事件而紧张，但同时双方认识到了为了危机管理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性。

然而，2001年发生的9.11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成为布什政权确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与西方同盟国同样，中国也迅速表明对美国的支援。与西方同盟国不同的是，虽然中国没有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援，但是因伊斯兰激进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活动，将由此获得的情报与美国共享，实际上对反恐提供了协助。由于这些缘故，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等，以协助反恐为契机开展与美国的合作。

2001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首次发表的美国政策文件。鉴于该报告发表于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约20天后的9月30日，所以推测其大部分内容在9月11日当时已经完成。因此，在该阶段一概没有反映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因协助反恐使中美关系得到的改善，而可认为是基于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前美国对中战略的内容。但是，2001年版QDR正文实际上没有点名提到中国。然而，“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平衡将会比较复杂。存在拥有庞大资源的军事竞争者在该地区出现的可能性”，该报告以不指名的方式表述了对中国的明确担忧。进而，在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美军变革”文章的第5章中可以明确看出对目前被称为反介入／反区域封锁（A2/AD）能力的军事威胁的担忧。该文章论述，认识到具体包括采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饱和

攻击阻止或拖延美军的介入，通过发达的防空系统阻止隐形战机以外的军机入侵，采用宇宙装备能力、超地平线雷达和隐形无人机对美军的监视和瞄准，采用反舰巡航导弹、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和先进型水雷阻止美国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接近沿岸海域，采用远程机动型弹道导弹和地面配置激光武器攻击宇宙资产等将构成对未来的美军的威胁，因此未来的美军必须将此打破，进行持续性监视、精确打击以及兵力部署。

另外，在作为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首次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以提出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采取“先发制人”论而著称的2002年版NSS中阐述，“美中关系是我们推动亚太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而繁荣的中国的出现”，虽然附加了前提条件，但对中国的发展表示“欢迎”。在此使用了“欢迎”的表述，可谓比关于中国发展的《东亚战略报告》(EASR) 1998年版阐明的认识（美国与中国分享中国作为稳定、繁荣的国家崛起的利益）进一步深入，也是基本上沿用至今的表述。另外在该2002年版NSS中，也论述了在朝鲜半岛、反恐、艾滋病问题等领域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可以看出美方对美中应合作的政策课题增加的认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寻求可能对亚太地区的周边各国构成威胁的先进军事力量，最终损毁自身的伟大，正在走落后于时代的道路”，该报告以强硬的态度表述了军事性担忧。另外，非常重视民主化的布什政权提出，“民主化发展对于中国的未来极端重要”，“中国将会认识到，只有社会性、政治性自由才能成为中国伟大的根基”，并阐述“美国寻求与变革发展的中国确立建设性关系”，可以看出对中国民主改革的期待。

如上所述，在美中关系方面竞争与合作两方面混在一起的形势下，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8月于纽约进行的演讲中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¹。在该演讲中需要注意的是论述“应推进不仅限于为了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一员而打开大门政策的时代到来。美国将促进使中国成为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部分。如果借助这段引用部分的内容，特别是克林顿政权推进的对中干预政策正是主要着眼于打开“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大门”。作为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再迈进一步，就是提出的将中国作为原有的国际社会一员对待²。不是将对中国的认识论定位于“国际社会外的新兴大国”，而是应重新定位于“国际社会中的新兴大国”，如果按照分论考虑，很难说对华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佐利克同时论述，“中国有责任强化使自身的成功成为可能的国际社会”，关于知识产权和市场经济的承诺、汇率、能源安全保障、北朝鲜以及伊朗等政策课题，要求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付诸努力。

此后的布什政权采取“塑造与防范 (Shape and Hedge)”的对中政策，换言之，在将中国的未来向着“负责任的大国”方向“塑造 (Shape)”的同时，为了防备军事性担忧的可能性也并行采取“防范 (Hedge)”，成为这种方式。这个方向通过2006年初期相继发表的2006年版QDR和2006年版NSS清晰地阐明。

2006年版QDR发表于2月份，在列出的4项战略目标中包含了“站在战略性岔路口的国家选项的塑造 (Shape)”。作为在此所指的“站在战略性岔路口的国家”，列出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具体阐述了政策方针，即“在寻求合作的同时，对于仅靠协调

性措施无法排除未来发生纷争可能性的可能性进行慎重的防范”。对于中国，“美国的政策是继续促使中国发挥在亚太地区的建设性和平作用，作为对反恐及扩散、毒品及海盗问题等广泛的安全方面的课题采取对策的合作伙伴提供协作”，“美国的政策是促使中国选择走和平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道路，而不是军事威胁和胁迫”，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的延伸，强调促使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指出“如果美国不采取对抗战略，在新兴大国中，中国是存在实战部署将会抵消长期以来美国拥有的军事优势的破坏性技术、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最大可能性的国家”，表明了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急速提升以及缺乏透明性的担忧。

另外，在发表2006年版QDR1个月后的3月发表的2006年版NSS中阐述，“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化竞争者，为了强化使中国自身的成功成为可能的国际社会，（中国）必须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协作，作为承担义务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采取行动”，“中国领导人主张已决定通过中国和平崛起走改革的道路。如果中国按照这种方式发展下去，美国欢迎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可能会对相互利益和共有课题展开合作”，在强调“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的同时指出，“然而必须认识到，如果中国领导人坚持陈旧的思考方式，继续保持使地区及世界各国更加担忧的老一套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将无法维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批评中国以不透明的方式继续提高军力，对于“防范”的方向性也清晰地阐明。另外，继提到民主化重要性的2002年版NSS之后，也指责了中国否认集会、言论、宗教的自由。

如上所述，布什政权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对待，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被称为“塑造与防范（Shape and Hedge）”的方针成为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不是仅仅采取协调性的对华政策，而是在认识到存在应与中国合作的政策课题的基础上，对于这些课题，要求采取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一致性的“负责任的行动”。其中，中国自身能否按照美国要求的方式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是问题所在。在接下来奥巴马执政8年期间的观察表明，中国并没有成为这种状况。

（2）奥巴马政权：“重返亚太”

2009年就任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在批评布什政权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同时开展选战。为此，当初的政策课题是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退。另外，能否从2008年成为表面化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也是重要课题。奥巴马政权的对华政策必须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制定。

奥巴马政权成立当初的对华政策是以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阐述的“战略再保证”的措词为代表的方针，即“如果保证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中国将与美国合作，为了世界的稳定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可以说是在布什政权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方面期待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方向性的进一步强化的政策概念。然而，由于后来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迫使对这种意向进行修正。首先在2009年3月，美国的监听船在南海受到中方干扰，发生了“无瑕号”事件，与布什执政时期发生的美中军机撞机事件同样，表明在南海存在军事紧张状况。另外，关于在

同年秋季召开的讨论地球温暖化对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的表现，中国向世界表明在全球性事务方面没有做好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准备，接下来因以南海问题的爆发和中国渔船在尖阁列岛违法作业为契机发生的与日本的危机状况的处理，以及中国在国防政策不透明的状态下推进截击卫星（ASAT）和隐形战机、反舰弹道导弹等所谓A2/AD能力的部署，不得不降低对美国希望的“负责任的行动”的期待。

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2011年以后，美国开始采取重视美中关系的竞争性一面的战略。具体在2012年1月发表的“国防战略指导方针”（DSG）中阐明了被称为“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或“向亚洲的再平衡”战略。该DSG尤其强调重视对A2/AD能力的应对以及干预亚洲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可发现与2001年版QDR的类似性。如上所述，在2001年版QDR中也切实表述对A2/AD能力扩散的威胁，并且关于重返亚洲也同样，在2001年版QDR中指出，“沿着从中东至东北亚的广阔不稳定弧线，崛起的地区大国与衰退的地区大国流动、混杂在一起”，并阐述“与其他重要地区相比，对于该地区（特别是从被称为“东亚沿海”的孟加拉湾至日本海的区域）的美国基地的密度较低，介入的基础设施较弱”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在DSG中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利益产生不断变化的课题和机会，在从西太平洋及东亚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广阔弧线上展开并密切相关”，并阐述“美国需要向亚太地区再平衡”。如上所述，两者对战略环境认识的类似性极高。如果根据2001年版QDR的基本框架是在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前形成的推定，关于两者的类似性，奥巴马政权的“重返亚太”的本质如布什政权当初寻求的那样，可以认为暗示着向“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前的亚洲战略”回归。

这就意味着美中关系的竞争性一面增大。关于该倾向，可以从2015年版NSS中领会。首先作为总体性美中关系认识，指出“虽然与中国的合作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持续戒备，不允许将这些用于威胁手段来解决领土纷争”，在提到美中之间合作进展的同时，以非常强硬的态度批判中国的军事力量现代化和向周边国家炫耀的态度。进而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指出，“美国欢迎安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美国寻求与中国确立建设性关系，从而为中美两国国民带来利益、增进地区与世界的安全保障和繁荣”，阐明寻求在气候变化及经济成长、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以“虽然美中存在竞争，但否认对决不可避免的考虑。同时，关于美中竞争，美国站在强者的立场对待美中竞争，对于中国，从海洋安全保障和贸易、到人权等问题，寻求支持国际公约及规范”，以“对于中国的军事力量现代化和在亚洲存在的扩大，美国将在不断降低误解及误算风险的同时持续监视”的方式，用以往NSS未曾有的强硬态度阐述竞争一面。

继承布什政权“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的奥巴马政权对华政策的主要论点是，即使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对待，可以说存在如何向“负责任的行动”引导的问题。显然，无论仅采用单纯的和睦友好手段、还是仅采用以军事压力为中心的手段，都可能无法实现该目标。例如在奥巴马政权历任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中国部长及东北亚资深部长麦艾文（Evan S. Medeiros）在进入政权之前发表的论述中阐述，①通过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美中直接协商的干预；②为了减少周边各国在安全方面的担忧，提高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动机，提高对美国的地区安全保障承诺的平衡；③通过这些措施，将中国纳入以遵守规范及法律为基础的原有国际社会，约束其行动的整合，提出由这3根支柱构成的对中政策³。

就奥巴马政权实际上采取的对中政策而言，我们认为将其视为奥巴马政权的基本对中政策框架不会有较大不同。奥巴马政权定期举行S&ED等大规模两国间协商以及战略安全对话（SSD）等国防机构之间的两国间协商。这并不单是以会议为目的举行的。S&ED是有关贸易均衡及知识产权、汇率等问题，国防机构之间的协商是有关提高透明性和对军事行动设定危机管理框架等，美中为了将非常具体的论点作为议题讨论，设定了这些机制。作为对中强硬派学者而著名的阿龙·弗里德伯格在2012年发表的文章中论述，对中国的干预不是推进自我目的化，而应明确设定应寻求的结果，应采取结果指向型措施，对以迄今曾讨论过的形式推进“塑造（Shape）”持怀疑的立场⁴，观察这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奥巴马政权从其初期阶段开始推进结果指向型协商。以习近平主席访问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2013年美中元首会晤为开端，美中两国共举行了13次元首会晤。在推进全球化发展的现代世界，可称为特点的是这些会晤的大部分并不是互访，而是利用核安全峰会和20国集团峰会（G20）等多国首脑会议的机会进行。据报道，在这些首脑会谈中，奥巴马总统对中国通过网络攻击窃取情报提出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了应对等，也可以看出结果指向型构想。对此，与可被视为正是以交流本身为目的克林顿政权当时的干预政策比较，可以说发生了质的巨大变化。

关于取得平衡，虽然其支柱将会是日美同盟，有关普天间机场搬迁，从2009年起至2010年，取消了当时政府此前的方针。虽然寻求新的方向，但是也因没有实现等发生了混乱，所以可能要等到第1届奥巴马政权后期提出“重返亚太”后解决。按照这个思路，美国在东北亚以调整“日美防卫合作方针”为中心加强日美同盟，在东南亚强化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承诺以及推进与以越南及菲律宾、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强化。

虽然这些问题最终可以认为以将中国统合到以规范及法律为基础的原有国际秩序为目标，然而就结果而言，可能不得不承认该目标没有实现。对于其理由可评价为以下4点。第1，被继承到胡锦涛政权的中国的“韬光养晦”路线到了习近平执政时发生了巨大变化，毫不犹豫地表明对外高压姿态。第2，与此关联，中国果断地表明无视国际公约的态度。例如，中国无视联合国海洋法条约，强硬坚持有关南海九段线的主张，公然无视菲律宾提起的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决，力求其无效的态度等等，我们推测中国的这种态度对于美国而言是超出预想的事态。第3，尤其关于南海问题，东盟无法成为一体应对中国，因此平衡的效果受到限制。特别是柬埔寨等亲中国的东盟国家，无法支持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越南及菲律宾，于是东盟总体无法形成应对中国的高压、单方面行动的局面。另外，向国际仲裁法院提起诉讼的菲律宾自身，因总统选举发生了政权交替，所以对中政策出现变化等，也发生了变故。第4，关于美中之间的问题，虽然美中直接协商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对于有关地区安全总体的中

国的行动没有产生改变。

如上所述，作为奥巴马政权，虽然可以说在有关美中两国间问题的干预、地区安全保障的平衡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有关应被称为其目标、将中国向国际社会统合的成果有限。可是，开展结果指向型美中协商的习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的承诺增加，可以说是奥巴马政权的成果。根据这些成果，今后的美中关系将会发展。

（3）特朗普政权：亚洲战略的再构建？

在2016年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从预选阶段开始，被认为持与美国政治家主流派（被称为所谓“建制派（Establishment）”）不同立场的唐纳德·特朗普的发言受到关注。例如，他于2016年4月4日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失去意义”，只要不增加其他加盟国的负担应退出NATO。另外，对于日美同盟也作为主要内容指出，与美国防卫日本同样也要求日本防卫美国，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美国应离开日本。

此外，在选举过后的2016年12月，特朗普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作为采取“一个中国”政策的美国，当选美国总统同台湾总统通电话史无前例。由此可见，特朗普在正式就任总统前，对欧洲及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积极承诺，这些是否对冷战后、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进行根本性变更，对此也存在一些担忧。

然而后来这种担忧大幅减小。2月9日，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发表了美国同意尊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声明。2月10日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明，尖阁列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明确将维持关于亚太地区对外政策的基本框架。另外，对于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美国于4月6日进行巡航导弹攻击，由此表示根据需要行使武力，通过行动表明美国将继续对世界的安全保障做出承诺。

在亚太地区也同样，面对北朝鲜一次又一次的挑衅以及继续开发核武器及导弹，美国综合运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施加压力，并且在南海实施比奥巴马政权更加频繁的“航行自由”作战。由此，特朗普政权通过具体行动表明了美国将与以往同样积极干预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的意向。对此采取怎样的战略框架推进，这是特朗普政权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的重大课题。其核心问题明显是对中政策。从布什政权开始到奥巴马政权为止期间的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塑造与防范（Shape and Hedge）”，如上所述，需要对其妥当性重新进行全面讨论，并全面调整此前的对华政策。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针对这些论点，2017年12月18日发表的2017年版NSS做出了回答。在美国，有国防部制定的QDR（2014年版以后废除）、“国防战略”（在2006年和2008年制定后，2018年1月制定了最新版）、“国家军事战略”等几个战略文件。其中虽然NSS被定位以最高级别，但此前在实际中大多在较低级别战略文件之后发表。事实上作为布什政权和奥巴马政权，首先制定QDR，然后制定NSS。鉴于这种情况，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第1年的12月先于其他战略文件制定了NSS可称破例。

该2017年版NSS的主要特点是，以对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悲观性预期为基础，明确了全面调整对华政策。首先，在该NSS中表明了美国对世界的总体观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显示出很大程度的战略自信”，“美国相信自身的军事优势得到保证，同时，民主主义带来的和平自然会实现”，“美国相信，通过扩大自由民主主义，将其他国家纳入其中，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平协作将取代竞争”，批判性总结了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基本前提，指出“大国之间的竞争重新出现”，“中俄开始再次扩展地区性和全球性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作为打破现状势力的中国和俄罗斯、属于流氓国家的伊朗和北朝鲜、以及形成跨国威胁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3个方面是美国面临的挑战。特别关于中国，指出“中国试图将美国从印度太平洋地区赶走”，表明了极为高度的戒备，进而阐述“美国必须重新考虑过去20年间的政策。该政策立足于这样的前提，即与竞争对手接触，如果将其纳入国际组织和全球性经济中，他们将会变化成为温和并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然而在几乎所有方面表明这些前提是错误的”，严厉指责克林顿政权以来的干预政策和布什政权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

作为具体的亚洲安全保障的思路，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11月10日在APEC首脑会议（越南岷港）上发表的演说中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并同时阐述“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关于世界秩序重视自由的设想与重视压制的设想正在发生地缘政治性竞争”，表明了关于地区形势的认识，对于中国提出“虽然美国打算继续与中国合作，但是中国运用经济手段和军事手段，对他国采取的政治和安全保障政策施加压力”的批评。然而在该NSS中，尽管对此前的美国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以及中国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指责，但却没有表明具体的对华政策。但是，应该关注的是在奥巴马政权的政策文件中必定包含的“美国欢迎安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的内容完全没有出现。在要求对“塑造与防范”采取全面调整的局势下，特朗普政权选择的是舍弃此前推动的、作为干预政策延伸的“塑造”，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评价。最初从尼克松政权开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是“在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之前使其变化”。无论是克林顿政权的干预政策还是布什政权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在其思路上可以理解。然而中国在奥巴马政权时期成为表面化的单方面的、高压对外行动表明无法“在成为强大之前使其变化”。今后对华政策的基本战略前提是“面对（变化之前）已经强大的中国”。2017年版NSS对该问题做出了一个解答。今后，以此为基础制定的新的对华政策将会对世界的安全保障产生长期影响，其未来的动向受到关注。

2 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动向的分析

(1) 关于A2/AD能力的分析

在考虑美中关系方面，军事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一方面，已经在1995年版EASR中指出关于中国军事的情报不足等，中国的国防政策、尤其是具体的军事战略以及国防经费内容的不透明性是长期持续的问题。美国议会在2000年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第1202项对国防部规定了在考虑军事技术发展的同时评估中国军事的现在和未来向议会报告的义务。此后，美国国防部每年提出报告，这就是《中国军力报告》⁵。在中国自身依然没有公布具体的军事力量部署计划的现状下，该报告阐明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如何分析的，同时其作为有关中国军事的可获得情报成为非常重要的资料。

本节不是回顾各年度报告进行总结性阐述，而是研究美国通过该报告对A2/AD能力以及核力量两项内容进行了怎样的分析。

首先关于A2/AD能力，最初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2002年版几乎没有阐述。在此前的2001年版QDR中，如上所述，由于详细阐述了对未来设想的反介入能力，虽然与其中的不同非常明显，但是当时作为特别关于中国的具体情报评估，可能无法阐述A2/AD能力的详细内容。当时，虽然出现了反介入的术语，但这是通过对计算机网络的攻击（目前的网络攻击）阻止美国的行动，采用了这样的思路。从《中国军力报告》2004年版开始首次出现了“反介入战略”的章节，阐述中国为了阻止外国的军事介入，部署了深海域及浅海域水雷、攻击型潜艇、巡航导弹、特种部队以及电磁脉冲等。到了2005年版，阐述了与2004年版同样的反介入能力，另外还提到精确打击以及存在通过网络攻击对方弱点、称为“杀手锏”的程序。

直到2005年版为止，没有使用目前采用的A2/AD能力的术语。当时，对于这些问题仅作为反介入能力阐述。属于目前被称为AD的部分也是在2005年版首次出现，当时使用了反海洋拒止能力的术语。与其相关，在2005年版中，关于为了获得超越台湾海峡周边的制海权而构建进行海洋拒止及反介入作战概念，做出了没有该征兆的评估。

A2/AD能力作为术语在接下来的2006年版中出现。2006年版设有“区域拒止能力的出现”章节，阐述中国为了实现局部性海洋拒止，部署多层系统，为此除了通过指挥、统管、通信、计算机、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侦查（C4ISR）系统掌握目标信息和通过装备有巡航导弹的潜艇、反舰攻击机及水面舰艇以外，还推进从以色列引进的无人机（UAV）“Harpy”和国产UAV提高远程攻击能力和以反介入任务为目的的弹道·巡航导弹的运用。2007年版的阐述更加详细，做出了海洋、航空、宇宙作战能力组合、A2/AD能力形成了在分别重叠的同时开展多层攻击系统的评估，特别阐明了对远程反介入能力的戒备。

在2008年版中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关于反舰弹道导弹的阐述。在这里提到作为多层次化A2/AD能力的一部分，对以准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1的构架为基础的1,500km射程反舰弹道导弹、用于发现和跟踪目标的C4ISR系统、用于攻击水面舰艇的终端引导系统进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行投资，阐明中国正在开发对航母等在西太平洋活动的舰艇的攻击能力。以后，有关这些系统的阐述持续更新，最新版的2017年版报告阐明中国部署了①运用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②以对抗3,000km左右射程的弹道导弹能力为中心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③反舰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以及运用鱼雷的水面及水下作战能力；④包括指挥统管及导航支援的宇宙作战能力；⑤电子战能力及网络、宇宙相关能力组合的情报相关作战能力；⑥以使对方网络瘫痪为目的的网络作战能力；⑦具备500km以外范围防空能力的综合防空系统；⑧部署包括具有隐形功能的FC-31以及歼-20为中心的第5代战机和滞空型UAV在内的空中作战能力的评估。将这些阐述与在2001年版QDR中提出的未来的威胁进行比较，其类似性可能一目了然。换言之，美军目前必须来对抗在近20年前基本上正确预测其出现的能力。

（2）关于核力量的分析

关于核力量，最初的《中国军力报告》2002年版对中国的战略核力量进行分析阐述，虽然以20枚远程弹道导弹东风-5为中心，但正在向扩大了射程的东风-5A更新换代，并且也维持了10枚左右射程较短的东风-4，除了这些采用液体燃料的固定发射井方式，中国推进采用固体燃料的公路机动型东风-31、以及同样采用固体燃料的潜射弹道导弹（SLBM）的开发。后来，该报告表明了将SLBM称为巨浪-2作为东风-31的变化版推进开发的预测。2005年版提出了针对数量归纳的估测，关于东风-4的发射井、导弹分别拥有10~14枚和20~24枚，关于东风-5的发射井、导弹，分别拥有20枚。关于数量方面的估测，虽然在2006年版、2007年版中也继续进行，但是2008年版指出，由于部署了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ICBM）以及SLBM等移动式核导弹系统而产生了指挥统管方面的课题，特别是该问题对于运用装载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的中国海军可能更加深刻。关于这种指挥统管方面的问题，提到有第二炮兵（目前的火箭军）按照与上级司令部的通信中断的设想进行训练的报道。

2010年版提出了除了20枚东风-5和20枚东风-4之外，还部署了东风-31以及射程延伸型东风-31A约30枚的新估测。另一方面，2011年版略微改变表述方法，提出东风-4、东风-5、东风-31以及东风-31A合计55~65枚的估测，将总数略向减少的方向修正。2012年版仍然采用表示总数的方法，估测为50~75枚，也比上年度的估测略增。2013年版虽然也同样继续采用估测，但值得注意的是阐明了部署新型核力量指挥统管系统的评估。由此该报告评估了中国提高对第二炮兵的数个部队的指挥统管能力，其具体的评估内容是，提高了掌握ICBM部队状况的能力、不会影响所有指挥阶层的通信路径的设定和提高对数个所属部队同时传达命令的能力。该报告在此基础上也指出，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了可靠实现SLBM以及公路移动式ICBM等分散核力量的指挥统管，需要继续开发更加精练的步骤和指挥统管系统，使有关使用核武器的国家领导人的决定能够可靠传达。

2015年版提出了东风-4、东风-5A、东风-31以及东风-31A合计50~60枚的略向减少方向修正的估测。但是该报告列举了此前的估测中没有的东风-5B，被认为是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体（MIRV）化的ICBM。MIRV可使用1枚导弹运载多个弹头，因此在该阶段，

表2-1：中国的主要远程弹道导弹

名称	射程	种类	发射方式	燃料	部署年份	备注
DF-3A	3,000	中程	移动式	液体	1971	无
DF-4	5,500+	洲际	发射井式	液体	1980	无
DF-5/5A	13,000+	洲际	发射井式	液体	1981	无
DF-5B	13,000	洲际	发射井式	液体	2015	MIRV化
DF-21/21A	2,150	洲际	车辆移动式	固体	1991	无
DF-31	7,000+	洲际	车辆移动式	固体	2006	无
DF-31A	11,000+	洲际	车辆移动式	固体	2007	无
DF-41	15,000?	洲际	车辆移动式	固体	2017	MIRV化
DF-26	4,000	中程	车辆移动式	固体	2015	核弹头、常规弹头两用

（出处）根据《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6》，防卫研究所，2016年，第37页编制。

可运载的弹头数量多于导弹的数量（据说东风-5B可运载3个弹头）。

2016年版对数量大幅向增加方向修正。东风-4、东风-5A以及MIRV化的东风-5B、东风-31及东风-31A合计达到75~100枚，提出了前一年版近一倍的估测。该估测也被沿用到最新版的2017年版。

3 美中的“战略稳定性”与东亚的地区安全

(1) “战略稳定性”概念

前一节论述了美国国防部提出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关于对A2/AD能力及核力量阐述的变化。对此简明归纳，就是无论在常规力量还是核力量方面，中国正在急速推进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构建美中的战略稳定性成为重要的论点。

不仅限于日本，人们经常误解，所谓战略稳定性，并不是指稳定的战略环境总体的说法。这是威慑论的技术术语，具体由“军备竞赛下的稳定性”与“危机下的稳定性”构成。“军备竞赛下的稳定性”是表示平时相关性的概念，指相互兵力构成和军事技术动向不会促进军备竞赛的状况。

另一个“危机下的稳定性”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成为表面化升级到危机状态，是在相关国家正在相互开始战争的准备阶段发生作用的概念。在具体方面，概念指相互兵力构成及军事技术动向不会给发动先发制人攻击一方提供任何优势的状况，而是即使发动先发制人攻击，但在受到先发制人攻击后生存的残余兵力发起反攻，使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一方也受到严重损害的明显状况。如果属于这种状况，由于双方都不会有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动机，因此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危机管理相对容易。将这种状况作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为存在“危机下的稳定性”的状况表述。另一方面，如果发动先发制人攻击一方能够获得巨大优势，双方将会相互强烈感到“如果不发动先发制人攻击则输掉”。这时，由于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动机对双方的作用强烈，因此危机管理必然会发生困难。如上所述，战略稳定性指以兵力构成和军事科学动向等技术要素为中心，形成难以发生军备竞赛的状况，从而能够稳定地进行危机管理，基本上不包含政治性要素。从这个意义考虑，并不是指稳定的总体战略环境的措词。

其中，按照危机下的稳定性的观点，非脆弱性核报复能力在冷战时期的核威慑论中受到特别重视。非脆弱性意味着即使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也不会被摧毁、可维持充分的反击能力，如果双方具备非脆弱性核报复能力，则双方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动机有限。这是因为即使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也会遭受核报复，则攻击一方也将毁灭。因此，如果双方具备非脆弱性核报复能力，即使状况升级，也可以认为双方都不具备发动先发制人核攻击的动机。另外，从“军备竞赛下的稳定性”观点考虑也同样，如果部署了具备非脆弱性核报复能力，构成最小限度的威慑，则减少了进一步军备竞赛的诱因。

这种“危机下的稳定性”基本上是用于在冷战时期衡量美苏之间对峙的概念。虽然这仍是继续推进美俄核军备管理的基本原理，但是在中国的常规力量及核力量急速向现代化发展中，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也开始提到。

按照地区安全保障的思路讨论战略稳定性时，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稳定-不稳定悖论”。“稳定-不稳定悖论”指根据战略核级别的相互脆弱性的战略稳定性成立时可能发生的状况。如果在战略核级别的相互威慑状况成立，双方都会担忧直到该级别的纷争升级，在某个阶段自制行动，可预测对状况进行控制。然而反过来利用该状况，即使在低级别发生纷争，另一方认为对方的应对是威慑性的，也可以设想采取打破在低级别的现状的行动。因此，地区安全保障环境将出现不稳定。“稳定-不稳定悖论”表明的是这种战略核级别战略稳定性相反造成地区范围的安全保障环境不稳定的悖论状况。如果适用于东亚的安全保障，假设美中战略稳定性成立，如果引起地区性安全保障环境不稳定，则评估为发生了“稳定-不稳定悖论”。

（2）中国对美核报复能力与奥巴马政权的方针

迄今为止，关于核战略，除了“不首先使用”(no first use) 那样的原则外，中国没有以体系性方式进行过说明。为此，美国以公开资料为基础尝试了各种分析。其中的中心性见解是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相比，由于中国仅拥有极小规模核力量，因此将以小规模核力量实现最低限度威慑的“最小限度威慑”作为基本概念分析。对此，麦艾文(Evan S. Medeiros)和傅泰林(Taylor Fravel)在2010年指出，中国的核战略没有象美苏那样发达的理由是，中国的核开发以核技术人员为中心进行，关于同军事战略的整合性几乎没有考虑，以及因文化大革命造成包括战略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停滞，而在毛泽东及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层次，中国核力量的作用可认为是抑制美苏对中国发动核攻击，根据这个观点，即使受到核攻击，生存性较高的少数核力量对敌

国施加难以承受的打击是中国核战略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确证报复战略”概念⁶。他们的“确证报复”概念与美苏那样的以对方国家的完全破坏为目标的“确证破坏”能力相比也属于小规模,在以可靠施加难以承受的打击为目标的意义,也与最小限度威慑战略不同。

考虑到美中的核力量平衡,与从冷战时期开始持续保持巨大核力量的美国相比,中国的核力量极小。然而,在冷战时期根据反弹道导弹(ABM)限制条约禁止部署本土防御用弹道导弹防御(BMD)系统,即使废除ABM限制条约正式开始BMD系统的开发,考虑到针对射程远、下落速度大的ICBM部署BMD系统并不容易,因此中国显然具有一定的对美核报复能力。此外,在中国构建怎样的关系对于美国成为重要战略课题的局势下,如何定义和构建与中国在核力量方面的战略平衡,在美国的核战略中成为重要课题,这是自然的归结。从该观点观察的重要论点是是否应视为在美中存在“相互的脆弱性”。例如,能源部核安全保障局局长林顿·布鲁克斯(Linton F. Brooks)指出,由于中国具备对美国一定程度的核报复能力,因此关于美中的相互脆弱性,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要素”,提出对此应该承认的主张。另一方面,在布什政权时期曾负责核战略的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基思·佩恩(Keith Payne)指出,由于相互核威慑的本质性不稳定,因此指出提高导弹防御能力以能够对抗未来的中国核报复能力的重要性⁷。

关于这个问题,按照在奥巴马执政时期通过2010年的“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BMDR)和“核态势评估报告”(NPR)规定的步骤表明了一定的方向性。首先,关于BMDR,用于防御美国本土的BMD系统只是以朝鲜及伊朗未来可能部署的有限数量的ICBM为对象的小规模,不是以中国对美核报复能力的ICBM为对象的规模,另一方面,为了对抗地区性弹道导弹的威胁,表明了扩大宙斯盾BMD等的部署。进而NPR提及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该战略的稳定性。但是,美俄对战略稳定性的考虑与美中的考虑之间的阐述存在差异,可认为具体的含义不同。关于与俄罗斯的关系,阐述的内容是接受了作为冷战期间战略稳定性基本概念的相互脆弱性。然而关于与中国的关系,没有意味相互脆弱性那样的细微差别,使用了“基于互信的战略稳定性”的措词,强调加强信赖和提高透明性。也就是在美中之间,与相互脆弱性相比,通过提高透明性等降低向军备竞赛发展的诱因、重视军备竞赛的稳定性,可以这样评价。综上所述,作为奥巴马政权,关于与中国之间事实上存在的相互脆弱性,虽然无法通过美国本土防御BMD系统的强化进行物理性否定,但同时也没有对其的存在予以公认,可评价为采取了这样的政策。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3) 美中的战略稳定性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

如前节所述,作为奥巴马政权,关于美中的战略稳定性,不提相互脆弱性,而是采用强调透明性和信赖的重要性方式的宣言政策。如果考虑目前的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可认为这是妥善的政策。目前在亚太地区,在东海及南海,中国的高压活动和渐进性改变现状的尝试令人担忧。

另外,中国以强化A2/AD能力的方式推进常规力量的现代化发展。其中也推进战域等级的弹道导弹力量的强化,使该地区的地面基地的脆弱性增高,在一定条件下,将出现中国获得与美国常规力量相比处于优势的状况,对此的担忧正在增加。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美国公认存在基于相互脆弱性的战略稳定性,“稳定-不稳定悖论”具体化,存在中国的活动进一步发展成为高压、单方面行动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认为,关于相互脆弱性,美国今后也在不明确承认的前提下,最好继续坚持构建美中战略平衡的政策。

此外,中国核力量的急速向现代化发展未来会带来新的课题。根据最新版《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战略核力量估测为75~100枚的规模。其中包括已实现MIRV化、可运载3个弹头的东风-5B。关于该ICBM的数量,虽然在《中国军力报告》中没有阐述,但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行的《军事平衡2017》推测为20枚。假设该推测正确,并且如果分别运载3个核弹头,则中国可向美国发射的核弹头数量为140个。除此之外,该报告还评估中国正在开发固体燃料、公路机动型的东风-41。该东风-41已实现MIRV化,认为可运载10个弹头,因此如果中国部署了东风-41,则可发射的弹头数量将大幅增加。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核力量的前提是可发射的弹头数量有限,因此以对城市的攻击战略为基本。关于上述确证报复战略的讨论也是以此为前提的。然而,对城市的攻击在核攻击中也属于门槛很高的选择,并非容易进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核力量不但规模大而且弹头的命中精度高,因此包括以对方核力量为目标的对兵力攻击在内,可实行所有选项。为此,关于美中的相互脆弱性,即使如林顿·布鲁克斯(Linton F. Brooks)说的那样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要素”存在,其实际状态也是极端非对称。

然而,如果部署了东风-41,则该状况将发生大幅变化。如果设想其具备与已经部署的常规弹头弹道导弹同样的高精度,则中国也能够进行迄今为止只有美国能够实现的对兵力攻击。目前,关于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因与俄罗斯签订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部署弹头数量的上限限制为1,550个。其中美国作为ICBM,对发射井式的民兵Ⅲ实现单弹头化,部署了400座。也就是如果假设中国为了摧毁美国的ICBM而发动攻击的情况,则目标将会是这400座发射井。这时,中国用于第一波攻击的可能是发射井式东风-5B和MIRV化、可运载多弹头的东风-41。这是因为发射井式导弹成为美国报复攻击目标的可能性较高。这样的话,由于20座东风-5B的最大弹头数量为60个,如果部署了34座东风-41,则可以分别对这些发射井使用1个核弹头攻击;如果部署了74座东风-41,则可以分别对这些发射井使用2个核弹头攻击。换言之,如果开始部署了东风-41,则中国可采用100座以下的部署构建由第一波摧毁美国的ICBM的态势。

当然,即使ICBM力量被摧毁,美国也可以通过SLBM反击,因此这本身并不能实

质性损毁美国的核威慑力。但是，也难以考虑美国会甘心忍受这种状况。作为一种可能性，可以考虑在部署民兵Ⅲ的后继ICBM时增加部署数量。对于这种情况，俄罗斯可能也同样不得不担心中国的ICBM，因此，继目前的新START后，美俄推进核裁军将可能非常困难。原本在3国之间，实现核军备管理极端困难。由于不得不考虑其他两个国家联合对抗另一个国家的状况，分别构建与其他两国合计数量同等规模核力量的动机强烈作用。也就是说，3国按照几乎同等规模拥有核力量的状况，在战略稳定性中，不得不成为“军备竞赛下的稳定”极低的状态。

由于这些原因，不仅限于地区安全保障的观点，而且也从全球核军备管理体制的应有方式的观点考虑，中国核力量的透明性缺失正在成为严重问题。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关注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动向，中国必须提高具体的核战略和核力量部署计划的透明性，明确且理论性说明自身的核力量现代化将构成国际社会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努力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会成为阻碍美俄核裁军的要因。

(撰稿人：高桥杉雄)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18

— 站在岔路口的美中关系 —

第三章 地区的美中关系的争议点

(撰稿人：山口信治)



在地区的美中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另外, 地区性美中关系的发展将怎样塑造 (Shape) 总体性美中关系? 本章针对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这三个地区性问题, 分析美中关系在这方面是怎样发展的。

1 朝鲜半岛

(1) 美国的姿态

作为美国, 北朝鲜问题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威慑的问题。换言之, 使北朝鲜放弃核开发、进而保护作为同盟国的日本、韩国不受北朝鲜威胁成为问题的焦点。

奥巴马政权的北朝鲜政策被称为“战略性忍耐”。战略性忍耐指使北朝鲜的完全无核化与体制保证及关系正常化挂钩, 将冻结核开发和延期核试验作为谈判的条件, 与日韩合作在通过经济制裁对北朝鲜施压的同时, 要求中国加强对北朝鲜施压的姿态¹。

在奥巴马政权的该方针中, 对中国发挥的作用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成为其前提的是中朝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观测。换言之, 中国以往有重视传统性友好关系、认为将北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区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见解, 以及有因无法控制北朝鲜的行为导致其在与美韩的关系中成为负担、这种对于中国而言形成战略性负债的讨论。在北朝鲜不断的挑衅行动中, 中国的忍耐也正在到达极限, 中国会逐渐看到与美国合作会获得利益, 美国具有这种期待。作为现实问题, 为了使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发挥作用, 认为中国的合作不可或缺。

作为另一个前提, 北朝鲜是脆弱的失败国家, 存在政权垮台的可能性。关于北朝鲜, 严重的危险虽然是北朝鲜推进核武器及导弹开发而具备核攻击能力, 但是作为与此同等、或者更可能发生的问题而认识到的是北朝鲜政权垮台的设想²。这时, 与中国的合作也不可或缺。

然而在现实中, 北朝鲜推进核武器及导弹的开发, 反复进行核试验及导弹试射, 表明对于北朝鲜的政策没有发挥充分的效果。其中在美国国内, 认为中国仅表明对无核化提供合作的姿态, 但却没有真正与美国合作, 因此应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这种意见逐渐强烈。

例如,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维克多·茶阐述, 为了让中国对无核化提供合作, 不应放弃对北朝鲜行使武力的选项。根据该阐述, 行使武力的选项和加强日美韩合作, 不仅能够加强对已具备核武装的北朝鲜的威慑, 而且对于使中国承担支持北朝鲜体制的长期战略性代价也有必要³。另外,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安东尼·鲁杰罗在众议院听证时提出, 作为政策建议提出除了直接对话、加强与同盟国的关系以及采取新的制裁外, 还有对中国施加强硬的压力⁴。

(2) 中国的姿态

目前，中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三原则”。坚持三原则是习近平于2013年6月表明的“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的原则。对于美国认为无核化最为重要的考虑，中国继续坚持迄今为止的维护和平稳定以及对话也同等重要的立场。

这样的原则反映了中国的复杂立场。一方面，中国不仅反对北朝鲜拥有核武器，而且对继续开发核武器和导弹、不断进行挑衅的北朝鲜固然非常反感。另一方面，中国不希望北朝鲜政权垮台，并且对美国以北朝鲜问题为口实加强美韩同盟或日美韩合作是否会形成对中国的包围持有疑虑。

在中国，对奥巴马政权的战略性忍耐大多认为是对北朝鲜施压、最终导致该政权垮台的政策。例如傅莹（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认为，战略性忍耐的本质是将无核化与承认北朝鲜体制挂钩。据此，只要解决核问题没有进展，美国就不会对话而施加压力，最终导致北朝鲜的政权垮台⁵。同样的理解相当普遍。北京大学的陈定昌分析指出，战略性忍耐是拒绝与北朝鲜对话，通过制裁和施压迫使北朝鲜妥协，进而促进其垮台或政权更迭的政策⁶。王俊生阐述，奥巴马的战略性忍耐期待北朝鲜的垮台，在其前阶段使半岛形势十分紧张，用于推进亚太战略⁷。某研究人员指出，美韩的目标是使北朝鲜走向垮台，这并不是中国的目的。制裁等施压，应是包括积极的因素及对话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仅靠制裁无法实现无核化，同时不应该采取使北朝鲜发生不稳定的制裁⁸。

了解了中国的这种担忧，美方作为正式立场开始表明不寻求北朝鲜的体制转变。2007年4月，国务卿蒂勒森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存在对北朝鲜体制不稳定的担忧，表明“不寻求（北朝鲜的）政权更迭、不寻求现政权垮台、不寻求加速实现半岛统一”⁹。8月以“不寻求政权更迭、不寻求现政权垮台、不寻求加速实现半岛统一、不寻求借口向三八线以北派兵”¹⁰的形式再次表明。中方将其称为“四不”，表示了正面评价的姿态。外交部长王毅在对此肯定的同时要求美国履行对北朝鲜的“四不”承诺，希望北朝鲜也应对此作出呼应¹¹。另外，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也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再次表示“四不”，希望美方把这个“四不”落实到实处¹²。

(3) 中朝关系的动向

朝鲜半岛问题取决于北朝鲜的动向，美中对其控制陷入困境。美国向中国施压的姿态以中国对北朝鲜有影响力为前提。另外，为了使经济制裁有效发挥作用，中国的合作不可或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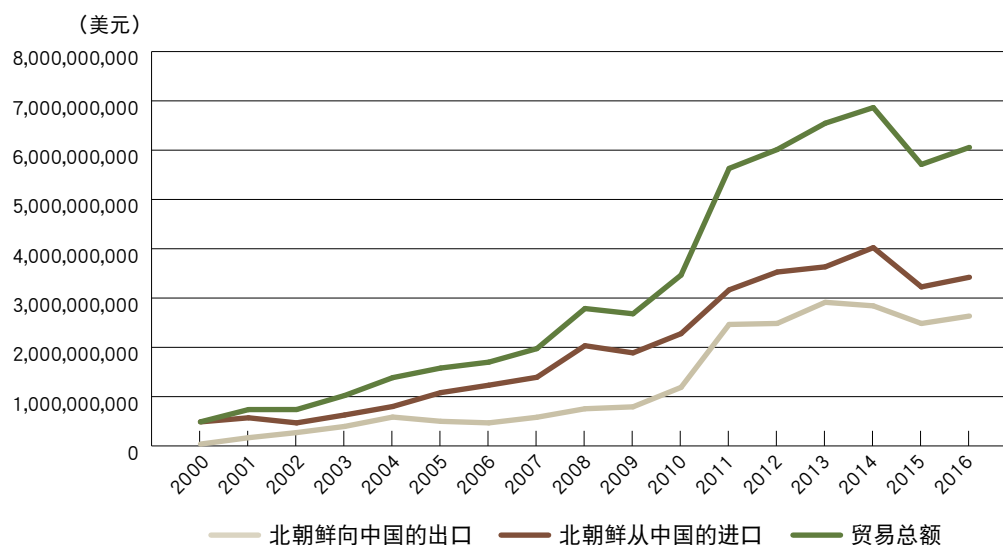
关于中朝关系，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并肩作战的历史经历，所以被认为是经常用“唇齿关系”、“鲜血凝成的友谊”来形容的特别关系¹³。根据1961年7月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朝建立了同盟关系。然而由于中苏对立和文革使中朝关系疏远。后来，邓小平制定了独立自主、不结盟方针，实质上的同盟关系结束。但是中朝维持着紧密的关系。王俊生指出，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与北朝鲜的实质性同盟关系结束，但是由

表3-1：中朝主要领导人的互访

2000.5	总书记金正日访问中国
2000.10	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访问朝鲜
2001.1	总书记金正日访问中国
2001.9	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朝鲜
2003.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朝鲜
2004.4	总书记金正日访问中国
2004.9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问朝鲜
2004.10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问中国
2005.3	首相朴奉洙访问中国
2005.10	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朝鲜
2006.1	总书记金正日访问中国
2006.4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曹刚川访问朝鲜
2006.10.9	北朝鲜第一次核试验
2008.6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
2008.8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问中国
2009.3	首相金英日访问中国
2009.5.25	北朝鲜第二次核试验
2009.10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朝鲜
2009.11	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朝鲜
2010.4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问中国
2010.5	总书记金正日访问中国
2010.8	总书记金正日访问中国
2010.10	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访问朝鲜
2010.10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问朝鲜
2010.10	首相崔永林访问中国
2011.5	总书记金正日访问中国
2011.9	首相崔永林访问中国
2011.10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朝鲜
2012.8	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访问中国
2013.2.12	北朝鲜第三次核试验
2013.5	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龙海访问中国
2013.7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访问朝鲜
2015.9	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龙海访问中国
2015.10.9	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访问朝鲜
2016.1.6	北朝鲜第四次核试验
2016.6	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洙墉访问中国
2016.9.9	北朝鲜第五次核试验
2017.9.3	北朝鲜第六次核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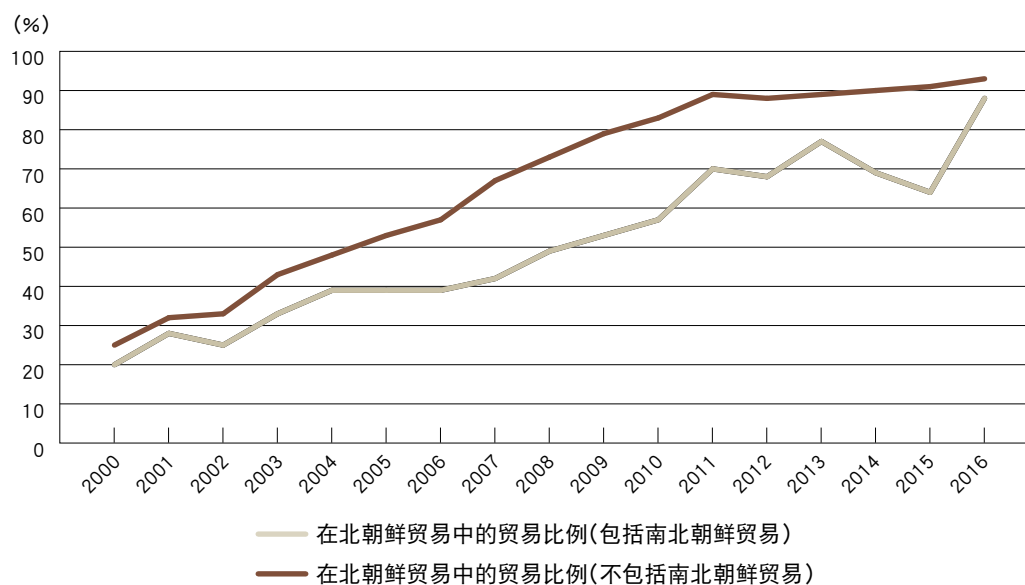
（出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朝鲜的关系”及各种报道编制。

图3-1：中朝贸易额的变化



(出处) By KOTRA (via North Korea in the World)

图3-2：在北朝鲜贸易中的对中贸易比例



(出处) By KOTRA (via North Korea in the World)

于冷战终结使朝鲜半岛失去战略平衡，因此通过与北朝鲜的特殊关系来维持平衡¹⁴。

然而，总书记金正日逝世后，随着金正恩体制的确立，中朝的政治关系向越来越恶化的方向发展。北朝鲜于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张成泽于2013年12月被处决，中朝关系进一步急速降温。从表3-1可以看出，金正日时代频繁进行的主要领导人的互访也逐渐稀疏。另外，朝鲜中央通信社于2017年5月首次点名谴

责中国等，产生了关系恶化的印象。

那么有关经济关系如何？2009年以后，在南北关系降温的形势下，虽然中朝的经济关系深化发展，但是在2014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¹⁵。如图3-1、3-2所示，不仅中朝贸易的绝对数量增加，而且关于在北朝鲜贸易中的对中贸易比例，如果不算南北朝鲜贸易则超过9成，即使包括南北朝鲜贸易也接近9成。

从北朝鲜向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包括煤炭、矿物资源以及服装。尤其是煤炭占北朝鲜出口的三分之一，是重要的出口商品。联合国安理会针对2016年12月的北朝鲜第五次核试验通过的2321号决议将至年底的中国煤炭进口额限制在5,300万美元（100万吨），然而8周后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的贸易商进口了200万吨以上¹⁶。中国虽然对包括民用品在内的经济制裁持消极态度，但是对于进入2017年后北朝鲜不断进行的挑衅行为，联合国安理会于2017年8月5日通过了2371号决议，煤炭及海产品等的进口被全面禁止。

另外，作为不列入通常贸易的项目有以民事援助的名目进行的石油出口。关于石油，虽然被认为北朝鲜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中国，但是实际状态并不明确。中朝之间有一条从中国丹东起直到北朝鲜新义州的原油输油管道，该管道全长30.3公里，管径377毫米¹⁷。这条管道作为对北朝鲜援助的一部分于1973年动工，1975年12月建成投产，在鼎盛时期每年提供100万吨以上的原油。由于设备的陈旧以及大庆原油含石蜡的特点，因此需要适当加热，并且如果停止供油将发生管道堵塞，所以可停止的时间受到限制。每年的最低安全输送量为52.5万吨，也被指出通过管道调节原油供应存在难度¹⁸。

总而言之，可以说中朝关系向着恶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政治关系空前紧张。关于经济关系也同样，虽然北朝鲜对中国的依存度较高，但在2014年以后不断降温。但是，这种情况与中国向美国提供合作没有直接关系。另外，究竟经济关系的密切性在何种程度上与中国对北朝鲜的影响力有关尚不明确。

（4）萨德（THAAD）问题

在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中美关系中，成为重要问题的是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的部署问题。萨德问题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复杂立场。

美韩开始讨论部署萨德系统的契机是北朝鲜于2014年2月发射了弹道导弹。后来虽然在韩国国内进行了讨论，但因为北朝鲜于2016年1月进行第4次核试验，所以开始了部署萨德的讨论，同年7月8日发表了在韩国部署的决定。美韩在部署时阐明，“这是防止受到北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威胁，保障韩国和其国民的安全，保护同盟军的防御措施”，“仅针对北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并不是针对第三国”，强调不是针对中国¹⁹。

但是中国表明强烈反对萨德系统的部署，向韩国施加压力。2014年11月，驻韩国大使邱国洪表明反对部署萨德。2015年2月4日访问韩国的国防部长常万全表示反对，在接下来于5月31日进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向韩国国防部长表示反对。中国对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正式表明反对立场，进而因决定部署萨德对赴韩观光以及韩国艺人在中国国内的演艺活动进行限制，并且对乐天等企业施加压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反对部署萨德？

第一，中国的许多议论者主张在韩国部署萨德会影响到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例如吴日强论述，由于北朝鲜在不远的未来几乎无法制造ICBM，因此美国部署萨德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²⁰。尽管北朝鲜的弹道导弹技术以超出预测的速度发展，吴日强依然强调萨德系统的雷达是对中国的核威慑能力的严重威胁。根据该论述，用于萨德系统的TPY-2雷达最远可到达1,500km，能够发现以美国为对象的中国的ICBM，并且也可以探测从中国沿海发射的SLBM²¹。吴日强的论述引导了中国的讨论方向。

中国作为正式的原则，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按照这个含义，保证第二次打击能力对于中国的核战略可以说至关重要。这些讨论论述了萨德系统将损害中国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实际上，萨德系统是否对中国的战略导弹产生影响，这一点并不明确。目前，雷达按照指向北朝鲜设置，并没有按照指向中国设置。另外，由于变更指向的方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迅速应对中国的导弹。此外，根据周边的状况，可以认为从设置的位置无法指向中国的方向。另外，TPY-2雷达分为进行目标捕捉、跟踪、识别的终端模式和探测上升阶段导弹的前线部署模式，可以认为终端模式能够探测约600km，前线部署模式可探测2,000km以上²²。美韩的萨德系统明显是采用终端模式部署，以拦截来自北朝鲜瞄准韩国的导弹，无法想象使用终端模式探测中国向美国发射的导弹。如果切换该模式，包括软件变更等在内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某中国研究人员承认，关于萨德问题，首先进行有关政治意图的解释，技术性讨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进展²³。

第二，对通过导弹防卫合作推进日美韩合作的戒备。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任张沱生阐述，中国对萨德的担忧，除了对中国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影响外，还担忧是否将成为韩国加入日美共同导弹防御系统的第1步，以及通过部署萨德是否会加强日美韩军事同盟²⁴。另外，王俊生阐述，日美韩三国军事同盟得到加强，以构建亚洲版的小NATO为目的²⁵。

第三，问题的根本是缺乏信赖，这种意见较多。特别是美中之间缺乏互信，使得问题复杂化。根据中国研究人员的谈话，中国无法相信美方不按照前线部署模式使用萨德系统的说明²⁶。根据另外的研究人员的谈话，萨德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经过美中协调，而美中之间缺乏互信是问题所在²⁷。

值得深思的是，尽管许多议论者将萨德问题作为美中之间的最终问题对待，但是中方的实际行动采取了对韩国施加各种压力的方式。在此可以看出的是，中国在发生问题时，致力于对地区的国家施加巨大压力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另一方面，采用在对美国谴责的同时避免使问题复杂化的方法。王俊生阐述，韩国的对中贸易依存度

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最高，这样的行动将成为在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借助美国压制中国的拙劣先例²⁸。

那么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将会考虑怎样的解决对策？对于该问题没有正式提出具体的方案，呈现对韩国持续施压的状态。对此，有专业人员论述，韩国撤除萨德部署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中国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对抗措施。例如，张沅生提出3项展望，①韩国停止部署萨德，最终撤除导弹防卫系统；②按照目前的程度继续部署萨德，中国采取必要的防卫性对抗措施，将利益冲突控制在可管理的程度；③美韩无视中国的担忧，进一步加强导弹防卫，增加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其中作为中国，虽然希望实现①，但是也有作为次善之策接受②的余地²⁹。另外，其他研究人员阐述，中国不得不增加核弹头数量，加强战略核潜艇，加强早期预警体制等对抗措施³⁰。实际上，中国于2017年7月在渤海湾实施了导弹试射，该导弹被认为是作为反舰弹道导弹操作性高的东风-26，用来牵制萨德的部署³¹。

2 南海

(1) 中国的南海政策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正式表明在南海主张怎样的权利。正式性最高的是中国在2009年向联合国提交的文件。中国宣布“中国对南海各岛及其附近水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同时对相关水域和海底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并附随地图表示。在地图中对南海的大部分画出了九段线，表明中国的某种主张。这就是“九段线³²”。九段线被认为是基于1947年中华民国出版的地图。然而1947年的地图与2009年的地图以及2013年以后出版的地图的九段线不一致³³。因此，首先在哪里划线没有确定。

进一步的问题是九段线没有明确主张的内容。虽然表明对线内的岛屿主张主权，但是九段线的范围超过了由此发生的领海及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尽管中国主张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然而对于究竟是什么却没有明确。

在现代，这种主张伴随着各种战略性利益，其重要性增加。这里有作为海底资源、渔业资源以及航道的重要性等。此外，在一带一路构想中，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南海。

另外，作为军事意义，面对南海的海南岛三亚市设有榆林基地，是两艘晋级核潜艇（094型）的基地。晋级核潜艇是中国首次装备的战略核潜艇，每艘可携带12枚巨浪-2弹道导弹。然而实际上中国将怎样运用晋级核潜艇，不明确的问题较多。因为巨浪-2的射程估测为7,200km左右，这样的话，如果从榆林基地发射只能到达阿拉斯加附近，没有形成对美国的有效威慑力。如果使导弹到达东海岸，则需要进入太平洋，然而晋级核潜艇的噪音较大，难以不被在反潜战中占优势的美国等察觉而进入太平洋。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目前中国正在开发新型的094A型，认为094A型将携带射程更远的潜射弹道导弹。

进而，为了切实保证潜水艇的残存性，中国具有在南海海洋确保军事优势的动机。为此，中国加强反潜战能力，最近在南海部署了反潜巡逻机Y-8Q（高新6号）³⁴。作为中国官方媒体的中央电视台（CCTV）报道，中方投资2亿元建设海底观测系统³⁵。

尽管中国在南海具有上述基本利益，但是如何获得这些利益属于政治性决定的问题。中国在南海追求目标的姿态从本世纪00年代后期开始向着积极、高压的方向改变。作为其背景是中国领导层持有的两个认识。

第一，受害者意识与不信任。关于南海问题，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对于东南亚各国，尽管采取避免冲突的稳健政策，但其他近邻国家借机强化本国的主张，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国家海洋局局长（当时）刘赐贵于2014年4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阐明“我国目前周边海洋权益维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总体上看，海洋资源遭到掠夺，海域被瓜分，岛礁被侵占，战略通道安全受到威胁，周边海域冲突多点爆发”的认识³⁶。在国家海洋局机关报登载的论文中阐述了认识，“部分海域被某些周边国家抢先开采，并挑战中国领海主权。虽然中国一直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但是一些周边国家置中国主张于不顾，抢先开发”³⁷。作为“被动的中国”在中国国内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受害者形象。

另外，对美国的不信任也根深蒂固。2010年以后，美国开始牵制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表3-2：中国在南海的主要行动一览表

类型	时间	行动	备注
妨碍他国的活动	2009年	“无瑕号”事件	海上民兵等妨碍美国舰艇
	2011年5月	切断越南调查船缆绳	
占据	2012年	占据黄岩岛	与菲律宾发生冲突，菲律宾的渔船无法进入该岛
采掘海底资源	2014年5月	西沙群岛海域	与越南发生冲突
	2017年7月	越南岛屿南部海面	对越南的石油开采施加压力
地形填海造岛	2013年～	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岛	在7个岛屿进行填海造岛和设施建设
	2012年～	西沙群岛的填海造岛	在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等
设立行政机构	2012年6月	设立三沙市	在三沙市设立军警民协调中心
施加压力等	2012年	限制从菲律宾进口香蕉	

（出处）笔者根据各种报道编制。

2012年提出了重返亚太政策。中国认为美国的重返亚太是牵制、封锁中国的战略，对于南海的纷争也谴责由于美国唆使东南亚各国而激化。

第二，自信的提高。中国随着本国力量的提高，开始感到可以提出比以往更多的要求。中国往往将在南海的纷争激化的原因归结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然而至少关于在南海的对立，是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政策之前开始的。从2007年前后开始，中国对英国石油公司和埃克森美孚公司等外国企业在越南和南海进行石油开采施加压力³⁸。如在第1章中的分析所述，中国提出“核心利益”概念，也要求美国对此尊重。原本限定为台湾、西藏、新疆的核心利益范围从2009年开始至2010年也扩大到南海。

那么中国将采用怎样的手段来追求目标？将中国在南海的主要行动归纳为表3-2。中国在南海没有采取使用武力军事性占领岛屿的行动。对于中国，虽然存在采取行动的更多余地，但在另一方面可以说在谨慎地避免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事态。

(2) 美国的南海政策

虽然美国并没有在南海提出领土要求，但是关于维持南海稳定和航行自由，在战略上从维持国际秩序的观点考虑也非常重要。对于美国关于南海的原则性立场，可以归纳成为以下内容³⁹。

第一，美国不对主权争端表明立场。原则上关于多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美国对于主权争端本身不表明任何立场。

第二，然而美国重视和平与稳定，反对以武力解决纷争。2014年2月，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明确指出，也包括采取使用武力以外的强制方式在内，“坚决反对以威胁、强制、武力解决领土争端”⁴⁰。

第三，关于海洋的法律管辖。2010年7月，在ARF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强调，“领土争端以及伴随其发生的海洋权利应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南海海洋的合法主张只能基于对陆地地貌的合法主张”⁴¹。该主张是对中国的九段线主张的牵制。2014年2月，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的证词进一步阐述，“中国的主张缺乏明确性。提出不基于陆地地貌的‘九段线’的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法”⁴²，否定了中国九段线的正当性。2017年10月，国务卿蒂勒森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为是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挑战”⁴³。

第四，与此关联，尊重航行自由。坚持航行自由的原则，重视对亚洲海洋共享的自由利用的尊重。

第五，支持东盟与中国建立《南海行为准则（COC）》。虽然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签署了关于争端的和平解决和建立互信的《南海行为宣言（DOC）》，但只不过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美国支持根据规则制定有助于南海的规定的行动和管理的行为规范，设立热线以及制定在敏感地区防止冲突的紧急措施等危机管理机制⁴⁴。

那么美国将会怎样实现这些原则？最重要的是在第2章阐述的那样，美国推进重返亚太，尤其加强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关系。

另一项行动是由美军进行的航行自由作战。航行自由作战是以表明对抗过度的海

表3-3：关于南海的航行自由作战

时间	美方舰艇和对象海域	过度的海洋主张	航行的性质
2015年10月27日	美国军舰拉森号(DDG-82):在渚碧礁等的12 海里内航行	要求通过领海时提出事前通告的主张	无害航行
2016年1月30日	美国军舰柯蒂斯威尔伯号(DDG-54):在中建岛的12 海里内航行	要求通过领海时提出事前通告的主张	无害航行
2016年5月10日	美国军舰威廉·P·劳伦斯(DDG110):在永暑礁的12 海里内航行	要求通过领海时提出事前通告的主张	无害航行
2016年10月21日	美国军舰德凯特号(DDG-73):在中建岛和永兴岛附近航行	关于直线基线的主张	公海航行
2017年5月25日	美国军舰杜威号(DDG-105):在美济礁的12 海里内航行	领海主张	公海航行
2017年7月2日	美国军舰史塔森号(DDG-63):在中建岛的12 海里内航行	要求通过领海时提出事前通告的主张	无害航行
2017年8月10日	美国军舰约翰·S·麦凯恩号(DDG56):在美济礁的12 海里内航行	领海主张	公海航行
2017年10月10日	美国军舰查菲号(DDG-90):在西沙群岛海域航行	关于直线基线的主张	公海航行

(出处) 笔者根据Eleanor Freu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Practical Guid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ug.10, 2017等编制。

洋权益要求，不接受这些要求为目的而展开的，从1979年开始进行，并不只是以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为对象。尽管如此，在美国表明不承认中国过度主张姿态的意义上，成为重要的手段。

(3) 菲中仲裁裁决后的动向

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对2013年菲律宾提诉中国的南海争端及行为做出基本上认可提诉内容的最终裁决。菲中仲裁裁决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测。关于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菲中仲裁做出了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抵触的裁决⁴⁵。另外，虽然本次对南沙群岛的7个岛屿做出了是岛屿、岩礁、还是低潮高地的仲裁裁决，但是菲中仲裁裁决更近了一步，裁决南沙群岛没有被认定为岛屿的地貌，并且也没有由数个邻近岛屿构成内水。换言之，南沙群岛由岩礁和低潮高地构成，因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伴随岩礁仅发生领海权利，不发生专属经济区的权利。

菲中仲裁裁决宣布后，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表态、外交部长王毅发表声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发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以及发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声明等，采取了接连不断的行动⁴⁶。

关于中国对菲中仲裁裁决发表的声明、发言的内容可整理为以下3点。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第一，中国不接受菲中仲裁裁决，否认其正当性。中国认为，国际仲裁法院没有对领土主权做出仲裁裁决的权限，因此该裁决无效，站在该立场，拒绝接受仲裁法院的裁决。

第二，中国认为，菲中仲裁裁决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其背后有使中国陷于不利的美国及日本的阴谋。例如，国务委员杨洁篪指出，“仲裁裁决的背后有阴谋，某些域外国家妄图借‘仲裁案’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权益，甚至拉帮结派，要在国际社会孤立、抹黑中国”。《人民日报》发表国纪平的署名论文更加直接地阐述，菲律宾的行动背景是美国对南海的介入，美国①将中国作为现状打破者；②通过《航行自由作战》，推动南海军事化；③拉帮结派，把南海问题引向国际化，本次的“仲裁裁决”也是这些一系列活动的延伸⁴⁷。

第三，主张本国在南海权利的正当性。中国发表白皮书，关于与菲律宾的领土主权争端，强调本国立场的正当性。另外，更加重要的是，以往中国采取了使其在南海的本国权利主张含糊的战术，然而本次发表的声明和国内舆论比以往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中国对南海的权利主张。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表明了①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②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③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④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的立场⁴⁸。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军报》登载的“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比以前明确定义了中国的九段线的权利主张。根据该论文，作为中国的九段线，①对线内的岛屿、岩礁、浅滩拥有领土主权；②对距离较近、可被视为一体的群岛或列岛之间的水域拥有历史性所有权，这里是中国的内水，可以从这些水域的外缘画出领海基线，并且可以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等国家管辖的海域；③九段线内的海域如果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及群岛国家的群岛水域重叠，中国对该重叠水域可以主张历史性渔业权和传统性渔业权⁴⁹。这些论述至少依法提出本国的主张⁵⁰。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阻碍仲裁裁决的执行，认为可使其无效，为此采取了各种对策。这就是①要求菲律宾进行两国之间的谈判；②避免东盟或欧盟联合起来谴责中国；③通过军事演习等对伴随菲中仲裁裁决结果的行为或“执行”发出警告。

第一，中国向菲律宾提出进行两国之间谈判的要求。外交部长王毅在关于仲裁裁决的谈话中提到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政权对与中国的对话持积极姿态，呼吁就南海问题开展对话。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会见记者时指出，对于仲裁裁决，“希望大家把这个裁决搁在纸篓里或者搁在书架上，放到档案馆留起来就完了”，避免触及仲裁裁决。此外，刘振民在呼吁与菲律宾进行对话的同时，也提出可被理解为威胁的发言，“如果菲律宾方面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必然会受到影响，目前的状况很难改变”⁵¹。2016年10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中，宣布与美国战略性分离。

第二，中国通过对东盟的外交攻势，力图避免发生其团结起来谴责中国的事态。

中国强调，“南海争端是中国与东盟几个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也就是强调“双轨思路”，进而通过个别的外交攻势实现东盟的分裂。本次，柬埔寨及老挝的首脑及政府官员也与中国领导人频繁进行会谈。由于柬埔寨反对东盟处理南海问题，所以东盟外长会议在联合声明中没有加入菲中仲裁裁决的内容。第三，中国通过展示军事演习等军事活动，向美国及菲律宾发出不要执行菲中仲裁裁决的警告，试图施加压力。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发言中阐述，仲裁法院的裁决是无效的，其执行是违法行为，“中国政府也会采取必要的手段阻止他们”。除了这样的发言外，南部战区在即将进行菲中仲裁裁决之前实施了大规模海上演习。虽然中国宣称该演习是按照年度计划进行，与仲裁裁决无关，但是三个舰队联合进行大规模实弹训练，可被解释为示威行动。此外，在菲中仲裁裁决后的7月19日，中方再次开始演习。在该演习时，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视察南部战区，强调提高海上的军事应对能力和稳妥处置各种突发情况⁵²。中国持续进行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设施建设。

3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性问题⁵³。现在也同样，台湾问题是可能引发美中冲突的重要问题。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迄今为止，美中制定了稳定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法。

对于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是关系到政权正统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对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另外还是国家建设的问题。现在的中国关于台湾的原则是“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则性立场⁵⁴。中国一贯坚持最终统一台湾的目标。

美国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继续维持对台湾的保证。也就是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中、1979年建交时、以及1982年的联合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另一方面，1979年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及1982年的6项保证，维持对台湾的保证，明确对采用和平手段以外解决台湾问题的反对姿态，并且规定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因台湾的变化使台湾问题的格局发生了改变。也就是随着台湾的民主化发展，突破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框架试图独立的势力开始获得支持。为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了牵制这种动向，江泽民指示于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等施加压力。

胡锦涛开始采用将强硬姿态和柔软姿态巧妙组合的软硬兼施手段⁵⁵。即改变将一举统一作为目标的方法，采取对台独势力以强硬对策压制，在这个前提下，促进柔软地与台湾进行对话和交流的2阶段方法。

对于美国，造成陈水扁是试图改变现状的麻烦制造者的形象，从而达到美中共同压制的目的。美国在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的发言后，对陈水扁政权的不信任逐渐加强，慢慢地开始采取压制陈水扁的行动。由此形成了美中协调压制台湾改变现状动向的格局。

2008年3月，国民党马英九政权诞生，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可能意味着成功地挫败了陈水扁政权试图推进的台湾独立。胡锦涛政权对马英九政权向对中接近的转向表示欢迎。胡锦涛以两岸关系的稳定为基础，作为下一个步骤提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针。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台湾对中国的依存度增加。这种经济性诱因阻止了台湾向独立的方向发展，人们期待着走向与中国的统一。另外，随着中国的军事力量向现代化发展，台湾海峡的军事平衡逐渐向中国占优势倾斜。

作为胡锦涛时代的台湾政策，阻止台独、并且以对中国有利的局势实现两岸关系的稳定，从这个意义出发，可以说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然而从这里开始向统一方向发展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没有进展。虽然中国与台湾建立了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共识，但是作为中国，维持现状始终是最低限度的基准，必须由此转向统一的道路⁵⁶。

习近平政权直接面对这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限度。最主要的是两岸的交流越是增加，台湾的台湾人认同就越是提高，明显出现了陷入无法看到统一前景的窘境。2016年5月的蔡英文政权诞生，也可以说是这种限度的表现。

在第1章中已经阐述，特朗普政权成立之前，特朗普对台湾问题表现了与以往不同的行动，台湾问题受到关注，但中国在表现出较为低调应对的同时，要求美国保持以往的政策。结果，特朗普总统表明尊重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后来于2017年6月29日，美国在特朗普执政后首次向议会通知将对台出售武器。这是包括高速反辐射导弹（AGM88）以及海上部署型拦截导弹（SM2）的部件等总额约14亿美元的军售。然而由于军售的规模较小，所以目前中国没有做出反应。

中国被认为在与美国之间避免突出台湾问题的同时，加强对台湾的施压。2017年6月，以前曾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另外，对此前在马英九执政时期认可台湾出席世界卫生组织（WHO）大会以及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大会等参加国际组织活动等施压，WHO大会和ICAO大会也不再邀请台湾参加。

4 地区的美中关系格局

关于在地区的美中关系，在问题之间进行比较讨论，可看到其基本格局。

首先，美中关于各个问题，如果从持有怎样的基本利益方面观察，朝鲜半岛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稳定、和平解决、无核化非常重要。无核化固然也重要，但是中国却不希望为此使北朝鲜垮台、或者使美韩同盟得到加强。关于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而言，朝鲜半岛无核化最为重要，并且也涉及到对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南海问题近年来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显著提高，虽然说其主张没有被明确定义，但是被视为应收复的领土。另一方面作为美国，航行自由和遵守海洋的法规秩序重要，并且也涉及到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台湾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的最重要问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未来一定要统一的领土。对于美国而言，台湾问题是应该按照一个中国的政策，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等维持承诺，维护和平稳定的问题。

其次，让我们比较一下问题的稳定性。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有取决于北朝鲜行动的因素，存在发生难以控制事态危机的可能性。关于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也较多，并且是已成为近年来急速发展的美中关系焦点的问题，不存在能够稳定处理问题的机制。因此，不能说该问题的稳定性高。关于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高度，所以是存在发生最大规模冲突可能性的问题。然而在另一方面，美中确立了稳定处理台湾问题的行动规范。因此，或许可以说问题的稳定性较高。

此外，作为概述这些地区问题时可发现的共同点，中国力求尽可能避免形成与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愿意采用对地区内的当事国施压的手段。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关于萨德问题对韩国、关于南海问题对菲律宾、关于台湾问题对台湾直接施压。认为采取这种手段的理由是，中国不希望与美国直接对决、考虑对地区小国施压能够发挥效果、以及考虑由此可以使美国与地区当事国分离。

最后，如在第1章中所述，中国可能以何种程度具备问题之间交易的视点？关于这一点，难以找到在中国的直接讨论。然而通过地区问题的比较，将会发现若干启示。首先作为前提，虽然美中对于各个问题致力于稳定处理，但是由于互不信任也根深蒂固，

表3-4：地区的问题比较

	利益结构	稳定性
朝鲜半岛问题	美国重视无核化 中国将稳定、和平解决、无核化并列	由于无法控制北朝鲜的行动因此较低
南海问题	美国重视航行自由和海洋的依法秩序，顾及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 中国主张“九段线”内的权利，战略重要性提高	不存在稳定处理问题的机制
台湾问题	作为美国维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维持对台湾的保证及和平稳定 作为中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未来一定要统一的领土	由于确立了稳定处理问题的行动规范因此较高

（出处）笔者根据各种报道编制。

序言

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专栏

结语

从一开始就难以进行大规模的交易。其次关于台湾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形成的结局仍然持续，令其变化可能并不容易。另外，朝鲜半岛问题可以说是在这些问题中美中开展合作的余地较大的问题。例如中国将对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提供合作作为回报而要求南海问题，是否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受到关注。

如上所述，本章分析了美中关系在东亚地区是怎样演变的。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分别是东亚地区的重要问题，在美中关系方面也可能成为重要问题。虽然美中关系是左右这些问题的重要关系，但同时也有东亚地区的问题发展影响美中关系的一面。

(撰稿人：山口信治)

关于网络问题的中美关系

在美中关系中，网络空间的问题近年来正在成为重要的担忧事项。随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与互联网连接的IoT（Internet of Things）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每天都会发生多种多样的网络攻击，而另一方面，社会对于网络攻击的脆弱性不断增加。这样的网络空间让中美关系的维持稳定并非容易。

美方关于网络问题，尤其对中国政府对美国企业的商业间谍行为不满。例如，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于2013年3月指出，来自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不仅包括窃取有关国家安全的机密情报，而且还包括窃取企业秘密情报及知识产权¹。中国政府及解放军将在网络空间通过商业间谍获得的情报向中国企业倒卖，美国担心丧失美国企业的优势及竞争力。

中方担忧美国窃取国家及军事机密信息、以及通过网络空间散布对共产党政权的指责。中国政府经常提到自己是遭受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国²，其主要戒备对象是美国。当因斯诺登事件（2013年）暴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全球实施的情报窃取对象中也包含中国的信息通信企业及高等教育机构后，对美国的不信任更加强烈³。对此，美国的信息技术企业被从中国市场部分排除等，也以波及到经济层面的形式表现出来⁴。

在这种两国的危机感和对对方不信任的背景下，在2013年6月美中元首会晤中，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企业遭受网络攻击迅速开展调查和制定规则达成共识。由此，美中采用与S&ED结合的方式，设立了网络安全工作小组。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件暴露了有关网络问题的中美关系的难度。因对连续遭受网络攻击而强烈不满，美国政府于2014年5月公布了嫌疑参与窃取美国企业秘密情报的5名所属于解放军的人员姓名和照片，发表了对嫌疑人缺席起诉。对此，中方宣布工作小组无期限中止，采取了对抗措施。

尽管如此，在力求避免对立方面，中美达成一致。经过水面下的协调，中美两国政府在2015年9月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中，就网络间谍问题达成共识。该共识的主要内容为以下两点，①两国政府都不进行或支持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②设立讨论网络犯罪对策、每年两次的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⁵。达成该共识后，除了在高级别网络问题对话中反复协商外，还据说对美国企业的网络攻击也减少，也有中美达成共识的成果得到肯定的评价⁶。另一方面，

也持续有源自中国对美国制药企业等进行黑客行为以及不经由网络的代理人的商业间谍行为的指责，美方对中国履行共识的担忧根深蒂固⁷。总之，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美中关于网络问题的共识今后会如何履行及运用。

此外，美中之间还有未达成共识的课题⁸。第一，关于军事方面的网络作战，美中之间不存在共识，稳定的抑制关系并不成立。中国于

2015年底在解放军内新成立了统括网络空间、电磁频谱、宇宙作战的战略支援部队，美国于2017年8月发表了将网络部队升级为联合作战司令部（UCC）等，两国均致力于提高在网络空间的军事作战能力⁹。另外，关于在网络空间被视为军事攻击的标准，攻击对象的禁忌等论点，在两国之间也不存在共识。

第二，关于在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及管理的应有状态，两国之间存在很大的认识差异。美国站在支持言论自由和民间主导创新的立场，限制政府对网络空间的介入，而中国根据“网络主权”的观点，通过网络安全法的整建，致力于加强政府对信息的统管。这种见解的不同也反映到对网络空间进行国际性管理的讨论。美国以包括日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内的同盟国为中心，推进制定适用于网络活动的国际法相关文件《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2》，而中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加盟国等推进网络空间的管理应有状态的协商，目前还没有看到两者认识收敛。包括这些课题在内，今后美中关于网络空间将如何构建稳定的关系值得关注。

（撰稿人：八塚正晃）

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18

— 站在岔路口的美中关系 —

结语

（撰稿人：山口信治）



结语

本报告阐述了以下内容。第一，直到本世纪00年代初期，中国持有劣于美国的深刻认识，将本国定位于“发展中大国”，重视对美关系的稳定。然而由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相对性力量平衡发生变化中，中国逐渐加强了坚持自我。这就导致了所谓中国外交的强硬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对立严重。关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论，根据原本作为核心利益的“相互尊重”的措词，对于中国考虑为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是将促使美国让步作为重点的概念。然而由于与周边国家的对立，对美关系逐渐恶化，中国开始担忧发生与美国的对决，因此渐渐地强调“不冲突、不对抗”，开始寻求中美关系的制度化。但另一方面，从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等可以看出，中国对周边各国的强硬立场没有发生大幅改变，因此对立的方向性没有出现变化。可以说中国在同时寻求两个方向，即对美关系的稳定以及强化在地区的自我主张。

第二，对于冷战结束后未来的方向不明确的中国，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规诫不能抱以不必要的敌视，采取了进行“干预”的方针，使中国不会构成安全的威胁。布什政权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对待，在其中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被称为“塑造与防范”的方针成为对中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不是仅仅采取协调性的对中政策，而是在认识到存在应与中国合作的政策课题的基础上，对于这些课题，要求中国采取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一致性的“负责任的行动”。奥巴马政权延续了布什政权的姿态，采取了以“战略再保证”的措词为代表的“如果保证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中国将与美国合作，为了世界的稳定发挥负责任的作用”方针。然而后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强硬，在美中关系的发展中，竞争的一面受到重视，奥巴马政权采取了“重返亚太”政策。但是不得不承认，应被称为其目标、将中国向国际社会统合的成果有限。

第三，观察地区的美中关系的发展，虽然双方致力于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双方的不信任增加。朝鲜半岛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稳定、和平解决、无核化非常重要。无核化固然也重要，但是中国却不希望为此使北朝鲜垮台、或者使美韩同盟得到加强。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而言，朝鲜半岛无核化最为重要，并且也涉及到对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安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存在取决于北朝鲜的行动而发生难以控制事态危机的可能性。关于南海问题，近年来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显著提高，虽然说其主张没有被明确定义，但是被视为应收复的领土。另一方面作为美国，航行自由和遵守海洋的法规秩序重要，并且也涉及到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关于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也较多，并且是已成为近年来急速发展的中美关系焦点的问题，不存在能够稳定处理问题的机制。因此，不能说该问题的稳定性高。台湾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的最重要问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未来一定要统一的领土。对于美国而言，台湾问题是应该按照一个中国的政策、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等维持承诺、维护和平稳定的问题。因为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高度，所以是存在发生最大规模冲突可能性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中美确立了稳定处理台湾问题的

行动规范，因此，或许可以说问题的稳定性较高。

美中关系的特点是其力量和认识的非对称性。中国的经济崛起十分显赫，同时军事力量的发展也非常突出，然而还不能说美中在力量方面的关系对等。在这个前提下，如何在政治上定位两国关系以及如何定义十分重要。

但是关于该政治定位，迄今为止美中的认识并不一致。中国对美国的意图持戒备，对本国的力量持自信，存在对美中关系比较乐观的倾向。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对于塑造中国、将其统合到国际社会的悲观性见解普遍，对中国的戒备提高。认识的差异和信赖的缺失是本质性问题，无法通过单纯的干预或扩大交流来解决。

这些问题的如实表现是地区的问题。在地区的各种问题中，出现了美中的利益和相互认识明显的差异。这些地区问题不仅影响到美中关系，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美中关系。另外，地区问题与战略性稳定直接相关，对此也不能忽视。如第2章所述，美国采用了重视军备竞赛下的稳定性的方针，而中国则重视以形成相互脆弱性提高战略稳定性。中国认识到，朝鲜半岛的萨德部署问题以及中国在南海的核潜艇问题与战略性问题直接关联。

分析关于美中战略稳定性状况，与“危机下的稳定性”相比，美国重视“军备竞赛下的稳定性，不提相互脆弱性，而是采用强调透明性和信赖的重要性方式的宣言政策。这是因为美中之间的核力量存在巨大差距以及宣称相互脆弱性可能导致“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具体化，因此可认为是妥善的政策。无论从地区安全的观点还是从全球化核军备管理体制的观点考虑，中国的核力量以及有关其战略的不透明性令人担忧。国际社会需要更加注意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动向，中国必须提高具体的核战略和核力量部署计划的透明性，明确且理论性说明自身的核力量现代化将构成国际社会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努力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会成为阻碍美俄核裁军的要因。

美中之间发生导致战争的冲突，不仅对于美中双方，而且对于亚太地区各国都是不想看到的。当然，美中关系的稳定无论对于哪个国家都最为理想。但是以包括改变地区现状在内的方式通过两国之间的妥协实现的稳定，在结果上不会解决问题，而是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能够对今后的美中关系要求的课题或许是稳定推进战略性竞争。为此，可能提出维持适当的力量平衡和进行对话两方面的要求。

（撰稿人：山口信治）

【序言】

- ¹ Graham G.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Victoria and London: Scribe Publications, 2017.
- ²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15.

【第一章】

- ¹ 新华社，2002年2月28日。
- ² 《人民日报》2009年1月13日。
- ³ 《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
- ⁴ 《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
- ⁵ 《人民日报》2004年2月25日。其他领导也表明了对形势的慎重认识。例如，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在2005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第4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上，根据集中学习时胡锦涛的讲话，论述了“战略机遇期”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在世界舞台上，我们应该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认识自身的局限”（蒋正华：“战略机遇期的风险与防范——在第四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会上的讲话（2005年12月2日）”巴忠倓主编《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和利用——第四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 ⁶ 《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 ⁷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 ⁸ 《人民日报》2004年8月30日。
- ⁹ 胡锦涛：“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09页。
- ¹⁰ 新华社，200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 ¹¹ 《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
- ¹² 《解放日报》2009年7月21日；本刊编辑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召开 胡锦涛强调提升‘4力’”《党史文苑》2009年第15期，第1页；杨洁篪：“维持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纪念新中国外交60周年”《求是》2009年第19期，第24页；陈向阳：“新时期中国大外交的方向”《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30期，第41页。
- ¹³ 胡锦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外交工作能力水平”《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6-238页。
- ¹⁴ 崔洪建：“新中美关系的想象空间”《人民论坛》2009年第23期，第5页。
- ¹⁵ 新华社，2009年11月17日。
- ¹⁶ 笔者对美国奥巴马政权相关人员的采访，华盛顿，2010年7月。
- ¹⁷ 陶文剑：“从《联合声明》看，奥巴马当政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
- ¹⁸ 中国外交部宣布，推迟双方拟于近期举行的中美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磋商，中方也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相关制裁。《人民日报》2010年1月31日；《人民

- 日报》2010年2月1日。另外，中国国防部除了宣布中美军事交流的临时停止，并根据局势，“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解放军报》2010年1月31日。
- ¹⁹ 《21世纪经济导报》2010年3月5日。
- ²⁰ 《解放军报》2010年5月26日。
- ²¹ 《香港经济日报》2010年7月2日。
- ²² 《华夏时报》2010年7月31日。
- ²³ [日]外務省「日米外相会談（概要）」2010年9月23日。
- ²⁴ [日]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概要）」2010年11月13日；『朝日新聞』2010年11月14日。
- ²⁵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Plus (ADMM-Plus): Concept Paper,” November 13-15, 2007,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DMM).
- ²⁶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Hanoi, Vietnam, July 23, 2010.
- ²⁷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pp. 78-89.
- ²⁸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本书编写组编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90页。
- ²⁹ 马晓天：“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时代内涵 明确我们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国际战略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6页。
- ³⁰ 《人民日报》2009年7月28日；“Chinese State Councilor Dai Bingguo Delivers Remarks at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Political Transcript by CQ Transcriptions*, July 27, 2009.
- ³¹ 《人民日报》2010年5月25日；“China-U.S. Dialogue ‘Pioneers Undertaking i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Official,” *Xinhua*, May 24, 2010; “Press Releases: Remarks at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trategic Track Plenary Session One,” *M2 Presswire*, May 9, 2011.
- ³² 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46-949页。
- ³³ 《人民日报》2012年5月5日。
- ³⁴ 《人民日报》2013年5月21日；《人民日报》2013年5月29日。
- ³⁵ 《人民日报》2013年6月7日；《人民日报》2013年6月11日。
- ³⁶ 《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
- ³⁷ 《人民日报》2013年7月11日；《人民日报》2013年9月12日；《解放军报》2013年9月26日；《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解放军报》201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14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5日；《解放军报》2014年4月9日；《人民日报》2014年4月10日；《人民日报》2014年4月30日。
- ³⁸ 崔天凯·庞含兆：“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 ³⁹ 同上，第5页。
- ⁴⁰ 同上，第7页。
- ⁴¹ 阮宗泽等：《权力盛宴的黄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对策》时事出版社，2015年，第123-124页。
- ⁴² 同上，第271-276页。
- ⁴³ 同上，第125-126页。
- ⁴⁴ 刘飞涛等：《中美分歧管控的理论与实践——以政治、经济、安全为视角》(CIIS研究报告第11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2015年，第4页。

- 45 张芳：《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 46 任筱峰：《海上军事行动法手册》海潮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 47 新华社，2015年6月11日。
- 48 任筱峰：《海上军事行动法手册》，第230-231页。
- 49 George Galdorisi and George Capen, "Military Contact is Lynchpin in Sino-U.S. Relations," *Proceedings*, Vol. 127, Issue 9, September 2001, p. 71.
- 50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Achiev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released August 2015, p. 16;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released April 2016, p. i, 13.
- 5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p. 13.
- 52 周琪·赵海：“特朗普上任之初内外政策推行受挫及其原因”《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3期，第58-77页。
- 53 "Trump Open to Shift on Russia Sanctions, 'One China' Policy,"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3, 2017.
- 54 尹继武：“《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第48页。
- 55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adout of the President's Call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February 9, 2017.
- 56 关于这一点，获得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顾问高木诚一郎教授的启示。
- 57 《人民日报》2017年2月10日。
- 58 《人民日报》2017年3月1日。
- 59 《人民日报》2017年4月9日；《21世纪经济导报》2017年4月10日。
- 60 《人民日报》2017年4月8日。
- 61 《人民日报》2017年4月9日。
- 62 《解放日报》2017年3月21日。
- 63 笔者对中国的研究人员的采访，北京和上海，2017年7月。
- 64 “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外交部网站，2007年6月22日。
- 6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Jim Mattis at a 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June 21, 2017.
- 6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reviewing the U.S.-China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June 19, 2017.

【第二章】

- 1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 2005.
- 2 神保謙：「『責任あるステークホルダー論』と米中安全保障関係」『東亜』2006年9月号、第24-35页。
- 3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 ⁴ Aaron Friedberg, "Bucking Beijing: An Alternative U.S.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2, pp. 48-58.
- ⁵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⁶ M. Taylor Fravel and Evan S. Medeiros, "China's Search for Assured Destructi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uclear Strategy and Force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2010, pp. 48-87.
- ⁷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NI Debates the Issues: U.S.-China Mutual Vulnerability," April 16, 2012.

【第三章】

- ¹ Emma Chanlett-Avery, Ian E. Rinehart and Mary Beth D. Nikitin, "North Korea: U.S. Relations, Nuclear Diplomacy, and Internal Situation," *CRS Repor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15, 2016.
- ² 例如, Bruce Bennett, *Preparing for the Possibilities of a North Korean Collaps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3.
- ³ Victor D. Cha, "Assessing the North Korea Threat and U.S. Policy: Strategic Patience or Effective Deterrence?"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the Pacific, and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October 7, 2015.
- ⁴ Anthony Ruggiero, "Countering North Korean Threat: New Steps in U.S. Policy," Statement befor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February 7, 2017.
- ⁵ Fu Ying, "The Korean Nuclear Issu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 Chinese Perspective," *Strategy Paper*, No.3,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2017.
- ⁶ 沈定昌: "美国与朝鲜半岛无核化"《东北亚学刊》2017年1月第1期、第36-39页。
- ⁷ 王俊生: "面对朝鲜半岛局势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东北亚学刊》2017年5月第3期、第40-44页。
- ⁸ 对研究人员的采访, 北京, 2017年7月4日。
- ⁹ "Interview with Bret Baier of Fox New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7, 2017.
- ¹⁰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1, 2017.
- ¹¹ 新华社, 2017年8月8日。
- ¹² 新华社, 2017年8月6日。
- ¹³ 然而沈志华表明, "鲜血凝成的友谊"的形象自身只不过是幻想。沈志华:『最後の「天朝」: 毛沢東・金日成時代の中国と北朝鮮 (上下巻)』朱建栄訳、岩波書店、2016年。
- ¹⁴ 王俊生: "中朝特殊关系的逻辑: 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1期, 第51-65页。
- ¹⁵ Fei Su and Lora Saalman, "China's Engagement of North Korea," SIPRI, February 2017.
- ¹⁶ Sue Mi Terry, "Countering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New Steps in U.S. Policy,"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February 7, 2017.
- ¹⁷ "我国输油管道之最" 中国石油网站, 2015年1月26日。
- ¹⁸ 堀田幸裕: 「中国の対北朝鮮援助: 中朝石油パイプラインを中心に」『現代韓国朝鮮研究』

- 第13号、2013年11月、第14-26页。
- ¹⁹ “ROK & U.S. Joint Statement: ROK-U.S. Alliance Agrees to Deploy THAAD,” 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July 7, 2016.
- ²⁰ 吴日强：“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美国侨报网》，2016年7月18日。
- ²¹ Wu Riqiang, “South Korea’s THAAD: Impact on China’s Nuclear Deterrent,” *RSIS Commentary*, No.192, July 27, 2016.
- ²² Ethan Meick and Nargiza Salidjanova, “China’s Response to U.S.-South Korean Missile Defense System Deploy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Staff Research Report*,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ly 26, 2017.
- ²³ 对研究人员的采访，北京，2017年7月3日。
- ²⁴ Zhang Tuosheng,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in East Asia: A Chinese Perspective,” *EAF Policy Debates*, East Asia Foundation, No. 77, June 27, 2017.
- ²⁵ 王俊生：“新时期发展中韩安全合作的意义、障碍与方向”《东北亚学刊》2016年1月第1期，第26-31页。
- ²⁶ 对研究人员的采访，北京，2017年7月7日。
- ²⁷ 对研究人员的采访，北京，2017年7月4日。
- ²⁸ 王俊生：“新时期发展中韩安全合作的意义、障碍与方向”第26-31页。
- ²⁹ Zhang Tuosheng,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in East Asia: A Chinese Perspective,” *EAF Policy Debates*, East Asia Foundation, No. 77, June 27, 2017.
- ³⁰ 对研究人员的采访，北京，2017年7月3日。
- ³¹ 国防部网2017年5月9日以及 “China Says It Successfully Tests New Type of Missile,” *Defense News*, May 10, 2017.
- ³² 虽然目前中国将名称统一为“断续线”，但是鉴于以往的知名度等并为了方便而使用“九段线”。
- ³³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Limits in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cember 5, 2014.
- ³⁴ “China Deploys New Anti-Submarine Aircraft to Fringes of South China Sea,” *Defense News*, June 22, 2017.
- ³⁵ “Beijing Plans Underwater Observation System in South China Sea,” *CNN*, May 30, 2017.
- ³⁶ 《中国海洋报》2014年4月14日。
- ³⁷ 《中国海洋报》2014年2月25日。
- ³⁸ Bill Hayt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36-144.
- ³⁹ Michael McDevitt, “The South China Sea: Assessing U.S. Policy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 *A CNA Occasional Paper*,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November 2014; M. Taylor Fravel, “U.S. Policy Towards th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ince 1995,” *Policy Report*, S. Rajarant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014.
- ⁴⁰ Daniel Russel, “Maritime Disputes in East Asi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5, 2014.
- ⁴¹ “Remark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 2010.
- ⁴² Daniel Russel, “Maritime Disputes in East Asia.”
- ⁴³ “US: Tillerson calls for India ties to counter China,” *BBC*, October 19, 2017.

- ⁴⁴ Daniel Russel, “Maritime Disputes in East Asia.”
- ⁴⁵ “PCA Case N° 2013-19 in the Matter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before an 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under Annex VII to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ward,”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July 12, 2016.
- ⁴⁶ 新华社，2016年7月12日。
- ⁴⁷ 《人民日报》2016年7月11日。国纪平是人民日报对国际事务进行重要评论的笔名。
- ⁴⁸ 新华社，2016年7月12日。
- ⁴⁹ 《解放军报》2016年7月18日。
- ⁵⁰ 祁怀高：“南海声索国对华政策解析与中国的战略思考”《边界与海洋研究》第1卷第3期，2016年9月，第43-57页。
- ⁵¹ 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7月13日。
- ⁵² 《解放军报》2016年7月20日。
- ⁵³ 有关详细内容，参照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著：《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7：不断变化的中台关系》防卫省防卫研究所、2017年。
- ⁵⁴ 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建立，参照福田円：『中国外交と台湾：「一つの中国原則」の起源』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
- ⁵⁵ 小笠原欣幸将其称为机动性手段。小笠原欣幸：「中国の対台湾政策の展開」天児慧・三船恵美编著『膨張する中国の対外関係』勁草書房、2010年、第200-204页。
- ⁵⁶ Richard C. Bush, *Uncharted Strait: The Future of China-Taiw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pp. 98-103.

【专栏】

- ¹ 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Transcript by *Asia Society New York*, March 11, 2013.
- ²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2015年5月。
- ³ 因斯诺登事件暴露了美国对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后，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人民网”2013年6月23日。
- ⁴ Jon R Lindsay, “The Impact of China on Cybersecurity: Fiction and Fri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3, Winter 2014-2015, pp. 26-28.
- ⁵ “Fact Sheet: President Xi Jinping’s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September 25, 2015.
- ⁶ 关于“美中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以美国司法部部长林奇、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与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为最高负责人举行了3次（第1次：2015年12月1日，第2次：2016年6月14日，第3次：2016年12月8日）。特朗普执政后，该对话改成“美中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2017年10月6日举行了第1次会议。Gary Brown & Christopher D. Yung, “Evaluating the US-China Cybersecurity Agreement,” *The Diplomat*, January 19-21, 2017.
- ⁷ Scott Warren Harold, “The U.S. – China Cyber Agreement: A Good First Step,” Rand Corporation.
- ⁸ 美国专家指出，关于网络空间美中认识不同的领域为，①为了进行经济、产业间谍活动利用网络空间的合法性；②为了开展更加传统形式的间谍活动及收集情报将网络空间用

于国家安全的目的；③为了军事作战对网络空间的未来利用；④为了管理领域内的信息利用而设想的国家拥有的权利；⑤互联网的国际规范、规则、物理性结构的管理方法等5个领域。Scott Warren Harold, Martin C. Libicki, Astrid Stuth Cevallos, *Getting to Yes with China in Cyberspac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p. 6.

- ⁹ “电磁频谱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指存在的电磁波谱系，根据频率分类为无线电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射线、伽马射线等。电磁频谱作战以使用电磁能削弱、破坏敌方电子信息设备、系统、网络及相关武器系统或人员的作战效能、同时保护正常发挥己方的作战效能为目的。参考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全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54、263页等。

